

編者的話

我們這一代青年人，是在新社會里長大的，沒有像自己的父兄那樣受過剝削階級和反動統治者的深重剝削和壓迫，也很少同剝削者、壓迫者進行過你死我活的鬥爭。因此，對舊社會的痛苦生活缺乏長期深切的體驗，更沒有經受過嚴酷的階級鬥爭的鍛煉。作為一個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弱點。

為了幫助青年同志了解舊社會反動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進行壓迫和剝削的罪惡，以及勞動人民進行反對壓迫、反對剝削的革命鬥爭的歷史，使青年同志能夠補上這一課，我們準備陸續編輯出版鄉村史、家史、公社史、工廠史的讀物。希望青年同志能夠認真閱讀這些書籍。讀了這些書籍，能夠幫助我們增強階級觀念，激發革命意志，培養革命的思想感情，提高革命警惕性，把無產階級的家譜一代代續下去，使我們一代代青年永遠沿着革命化的道路前進，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中做一枚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四史讀物的出版，還是一件新的工作，希望讀者讀了這一本《三代人的腳印》以後，能夠把你們的意見告訴我們，以便改進以後的編輯工作。

1963年8月

目 次

李丕忠家史.....	李丕忠	3
借了地主十五串錢以后.....	楊发祿	13
天下烏鴉一般黑.....	朱应安	21
父子恨.....	张明显	28
河洛田.....	王石宝	36
忆苦思甜.....	刘玉秀	45
一个破皮袋.....	安有良	51
卖身文契.....	李焕清	57
沒有共产党哪有今天的我.....	黃宝洛	68
从“苦菜花”到女主任.....	柯紅花	75
血海深仇.....	胡 羊 刘名泉	84
——霍丘县李家圩地主庄园罪惡紀实		
白骨建造的“天堂”.....	李 累 之 光	95
——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館調查記		

編者的話

我們這一代青年人，是在新社會里長大的，沒有像自己的父兄那樣受過剝削階級和反動統治者的深重剝削和壓迫，也很少同剝削者、壓迫者進行過你死我活的鬥爭。因此，對舊社會的痛苦生活缺乏長期深切的體驗，更沒有經受過嚴酷的階級鬥爭的鍛煉。作為一個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弱點。

為了幫助青年同志了解舊社會反動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進行壓迫和剝削的罪惡，以及勞動人民進行反對壓迫、反對剝削的革命鬥爭的歷史，使青年同志能夠補上這一課，我們準備陸續編輯出版鄉村史、家史、公社史、工廠史的讀物。希望青年同志能夠認真閱讀這些書籍。讀了這些書籍，能夠幫助我們增強階級觀念，激發革命意志，培養革命的思想感情，提高革命警惕性，把無產階級的家譜一代代續下去，使我們一代代青年永遠沿着革命化的道路前進，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中做一枚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四史讀物的出版，還是一件新的工作，希望讀者讀了這一本《三代人的腳印》以後，能夠把你們的意見告訴我們，以便改進以後的編輯工作。

1963年8月

目 次

李丕忠家史.....	李丕忠	3
借了地主十五串錢以后.....	楊发祿	13
天下烏鴉一般黑.....	朱应安	21
父子恨.....	张明显	28
河洛田.....	王石宝	36
忆苦思甜.....	刘玉秀	45
一个破皮袋.....	安有良	51
卖身文契.....	李焕清	57
沒有共产党哪有今天的我.....	黄宝洛	68
从“苦菜花”到女主任.....	柯紅花	75
血海深仇.....	胡 羊 刘名泉	84
——霍丘县李家圩地主庄园罪惡紀实		
白骨建造的“天堂”.....	李 累 之 光	95
——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館調查記		

李丕忠家史

林儿：

人上了年紀，总爱思前虑后的，退休以后，我常常思想咱家的情况。我从你爷爷手里繼承下来的，只有一条攪工、卖豆腐用的扁担。从一条攪工扁担到今天的幸福生活，这中間曾經經歷过多少苦难、多少风险，流过多少血汗呵！今天的幸福生活，这全是靠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艰苦斗争得来的。俗話說，“吃水不忘打井人。”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深如海。咱們是世世代代都要記住，都不能忘記的。

在空閑里，我把咱的家史整理成一个文字的东西。看看这份家史，你們就能够了解咱家是怎样在苦水里生活的，咱家是怎样翻的身。我常常对你們說，不能忘本，这就是咱家的根本。你們一定要把这本家史当作传家宝，代代相传，讓后代們也知道他們的祖先的根本，使他們也永不忘本。

祖祖輩輩受剝削 攪工扁担代代传

咱的老家，原在临县宮地村。据老人們傳說，在我的高祖父手里时，因为在本村攪不下工，租不下地，被迫迁移到临县槐树墘村。当年的詳細情况已无法考查，但从迁移老祖坟时，

只見枯骨头枕炭块，不見半点腐朽棺木的痕迹，貧困状况是可想而知的。

你們的曾祖父，喂猪、卖豆腐，苦了一輩子，穷了一輩子，活到八十四岁，临死也沒有賺下一床鋪盖。你娘娘（祖母）从你老外婆家拿回几块破毡片，縫縫納納，給你們曾祖父盖上，这算尽了很大努力，对老人的一点点孝敬。

你爷爷李应文老兄弟四人，都是靠攬工、半种地（租地的一种形式）、喂猪、做豆腐过活，到老来，几乎都是被貧困病餓折磨死的。

我們兄弟四人，从你爷爷手里接过来的，就是那么一条从你曾祖父手里传下来的攬工、卖豆腐用的扁担。

动荡流离 老人外出去攬工 飢寒交迫 忍痛出卖亲生子

黃連苦連心苦，苦不过穷人苦中苦。咱家本来就穷就苦，光緒二十六年又遇上了大灾荒年，穷上加穷，苦上加苦。你娘娘說，她一連四十天沒見一顆粮食，尽吃野草野菜，肚皮餓得像紙一样薄，吃蒲公英吃得指甲都发了綠色了。你爷爷出外攬工，地主只管吃，不給工錢。那年月是怎样熬过来的呵！

一九〇七年（那年我四岁），在槐树墪村实在活不下去了，你爷把我和你二叔一担子担上到处飄流起来。先到梁坡底，給富农高金保当长工。当长工养不了家，你爷爷就把你娘娘、我和你二叔寄养在你老外婆家。老外婆家同样是吃了上頓愁下頓，轉年你爷爷又把我們担到尧昌里，寻了間破窑，买了口



水缸，借了盞灯台，弄来些糠糠菜菜，把我們母子三人临时安頓在尧昌里，他又出外攬长工、打短工去了。

攬工养活不了家口，你爷爷又回到尧昌里，給富农毛老虎半种地。原想，这尧昌里“九顆疙瘩十八道塌”，尽是好地，怎样还混不下碗飯吃？誰想，你爷爷給人家干了三年，又被人家赶出来了，說他背鍋（駝背），干活不利爽。你爷爷原来身体多結实，硬是給地主扛活受累鬧下毛病。无奈何，你爷爷只好再外出流蕩攬工。

一九一五年，我刚滿十二岁。小小年紀就給麻塢地主曹侯狗家当了羊倌。山里狼多，一天碰上了狼，叨走了一只羊。我吓得渾身发抖，可是地主却指着我的鼻子大罵：“狼就沒有

把你吃了！給我滾蛋！”連羊倌也不叫咱当了。

羊倌当不成，可日子还得过呀！我就和你二叔到处跑着攪杂活干。誰家娶媳妇，我們就去給人家拉驴。人們說，拉驴是最下賤的事，咱那能顧上这些呢？誰家办婚姻大事，我們就去討口“喜食”吃。誰家盖房子，我們就攪点小工子活，給人家提提泥包送送水。你爷爷常常念叨：“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給孩子們寻下个脫嘴处呵！”

“拐腿牛怕滑，穷人家怕灾。”一九一九年大旱，半种地分的粮还不够还債。秋收刚完，家里就沒吃的了。你爷爷看家中呆不住，閃过年带上你二叔和三叔走了石楼。我到梁家坡給富农高金保当了长工。

家里还有你娘娘和你小四叔，他們的生活仍然沒着落，怎么办？你老舅出主意叫把你小四叔卖了。你娘娘痛哭流涕，亲生骨肉心連心，跟上人家也許能逃条活命，留在家里齐叫往死餓呀！泪湿衣襟，忍痛割心，把你小四叔卖了二十四吊錢，算救了你娘娘一条活命。

受苦受辱尧昌里 如牛似馬十二春

一九二四年，我二十一岁，你二叔丕孝十九岁，三叔丕吉也已十七岁。我們都长大成人了。弟兄們怕你六十五岁的爷爷失落在外，就把老人从石楼接回尧昌里。这样，一家人才算定居下来。

在尧昌里定居以后，咱家給地主“五閻王”薛永太当了地伙計(佃戶)，半种了他家一百一十亩地。半种地的規矩是：一

切工本底垫都是地伙计的，打下粮食却是和地主对半分。有三分奈何的人家，是不给地主当地伙计的。可是我们想，凭着兄弟三人的劳力，怎样还养活不了双亲和一个小小妹妹？我对你爷爷说：“爹，你放心吧，有我们弟兄三个，再也不让你老人家受饿了。”

可是，旧社会那有穷人如愿的事！老人们说：“攬工半种地，終久一肚气。”这话真是有血又有泪的。半种地的头一年，咱没有底垫，春天吃的粮要向地主借，种子要向地主借，牲口饲料要向地主借。这一年，偏偏又遇上了旱灾。秋后，五阎王的算盘子儿一拨拉，除了他的，咱们啥也没分下。没有吃的，只好再向五阎王借粮，五阎王不但不借，反而怒冲冲地说：“要借容易，先把以前借的全还清！”全家六张嘴都得要吃要喝呵！东求西借凑了两吊钱，买下一担粗粮、五升黑豆，暂时糊口。冬天，我和你二叔、三叔弟兄三个，风里雪里，起早搭黑，担磁卖炭，苦熬苦受，才算没有饿死人。

当了地主家的地伙计，那就成了套在地主车上的牛和马。地主不光是通过地租盘剥地伙计，而且还放高利贷。春天借一斗秋后还二斗，加上小斗出大斗进，实际上秋后得还二斗四。这还不算，地伙计还得无偿地给地主家服杂役。地主家一年三百六十天吃的水，全由地伙计给送。咱给五阎王家担水，早晨去得早了，人家还没起；下午去得迟了，人家门关了，咱说：“担米水了，开开门吧。”人家说：“你担动水，我开不动门。”咱心想，不开门就把水放在门口，你起来还不能提进去往缸里倒一倒，不想，人家根本不管，水原封原地放在那里，还得

咱給倒。至于“临时帮忙”，那就更不用說了，秋里誰家活計不忙，可是不管你手头活計多紧多忙，只要地主家一声喚，就得赶快放下自己的活計去“帮忙”。

旧社会，地富坏蛋横行霸道，真像是天地都是他們的。穷人屙屎也得先看看地方。有一次打麦碾場时，不小心讓牛屙到薛法柱場院里一堆粪，他就破口大罵：“龟孙們，为什么不把牛粪供献在你家神祖前！”而且硬要把咱家麦子往灰渣堆上倒。咱好說歹說不行，最后你爷爷出面求情、送礼，才算了結。又一次，咱家把扫院的一堆脏土倒在村里灰渣坡上。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对，灰渣坡就是倒脏土的地方嘛。可是，不知怎样就惹下乡紳薛明山，他指着我的鼻子罵：“天是我們薛家的天，地是我們薛家的地，那有你們外家百姓龟孙子們倒土的地方！”立逼我把土收起来，送到村外头去。

記得是一九三六年秋天，打完場，咱家把豆秸放在窑頂上。五閻王一見就罵：“龟孙子們把豆秸放在这里，讓老鼠掀塌我的窑頂怎么办！”我和你叔叔們赶紧把豆秸搬到院外牆角边，五閻王一見又罵：“这是放豆秸的地方？老鼠挖开洞，水冲塌我的窑怎么办！”没办法，我們又把豆秸搬到离窑很远的一堆烂土上，你猜五閻王說啥？他說：“放在那里，脏了我的土怎么办！”我心里真气极了，可是又得忍气吞声。我問：“你看放在那里，請指点指点。”五閻王威风抖够了，把臉一仰說，担到街圪塔上去。

这种日子，咱家在尧昌里过了十二年，受苦受辱的事情，那是說不完的啊！

干革命腰干越来越硬 恨入骨地富阴谋陷害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干部来到了尧昌里，发动群众，组织抗日群众团体；他们遇事总是找穷人们商量。我心里暗暗想：“世界上真还有这样好的人！”后来，村里成立了牺盟会^①。财主们说那是“坏人会”。我可觉得是好人会，就第一个报名参加了。

参加牺盟会以后，第一件工作就是叫我了解村里的情况，以便评合理负担。村副薛兴本（地主）对牺盟会的下乡干部说：“尧昌里中中常常，应评为二等。”我对他们说：“尧昌里二十几家富户，占着一千多亩好地，在磧口还闹着几家大买卖，有粮有钱，应评为头等。”牺盟会的干部听了我的意见，又做了些调查研究，把尧昌里评成了甲等。

这一下，真是一棍子捅了马蜂窝，村里的地富纠集起来，煽动人要开斗争会整我。恶霸薛丑兴叫嚷：“非把李丕忠那龟孙子剥得吃了人肉饺子不行！”旧村长张元功怕牺盟会的干部说他进步，不爱国，出来劝阻，才算暂时平了这场风波。我心里想，有共产党给我撑腰，怕你们什么。

一九三八年七月，我秘密地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打这以后我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觉得自己腰干子越来越硬了，工作也就更积极起来。可是，咱越是腰干子硬，越是工作积极，地富坏蛋们越是恨入骨，越要想办法“治”咱。平常找咱碴、打

^① 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是群众性的抗日组织。

麻煩就不用說了。他們千方百計想着奪咱家的飯碗，殺我的頭。先是五閻王要抽地。要攔在以前，咱就得求情哀告了。這一回就頂了他，我說：“半種地也得有個規矩，等秋收了再說。”地主就是這種骨頭，欺軟怕硬，你硬了他又不敢明目張膽地把你怎樣。後來閻錫山的頑固軍要兵，我和你叔叔們本來都不在出兵的範圍（我和你二叔過了年齡，你三叔殘廢），但是村里的地富壞蛋們一商量，硬把兵派在咱家名下。他們把你三叔給弄了去，頑固軍檢查不合格，又給退了回來。這一辦法不靈，又想別的計謀，硬說咱家侵占了社地（村里的公產）。地主富農來了一大堆，又是丈量又是盤算，這個說這裡有村里的一棵樹，怎麼不見了，那個說，窟頂上是社地，就是侵占公產。最後他們一致決議，叫咱家重寫一張地契，另罰咱家雇一個兵，並出二百八十塊白洋的罰款。

過了幾天，形勢緊張起來。村里的閻匪敵工團正副團長——地主薛華實和薛澤蕃召集一些地主富農開會說：“臨縣城已經殺開牺盟會了，咱們也動手吧，先把李丕忠收拾了再說。”幸亏有人把消息告訴了我，我趕快把隱蔽在咱家一個同志送走，自己也連夜逃走了。

打倒敵人建立新政权 反动階級陰魂不散

正當我走投無路的時候，一九四〇年間從西北來了咱們的隊伍——八路軍。八路軍就像秋風掃落葉，沒幾天就把頑固軍打跑了。晉西北各地普遍建立了人民抗日民主新政权。我回村後不久，擔任了村農會的秘書。新政权一建立，地主惡

霸着了慌。他們托上人找我說情。我想，階級仇深似海，血債要用血來還，這不是我李丕忠一個人的事情。接着我們就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開展抗日活動，發動減租減息運動，組織民兵武裝。經過這一連串的活動和鬥爭，打倒了惡霸薛興丑，煞了地主富農們的威風。許多貧雇農逐漸有了些土地，咱家也有了些土地。這是咱家祖祖輩輩夢想不到的事情呵！

窮人翻身，地主富農是不甘心的。他們表面上老老實實，背地里興風作浪。當時，堯昌里只有三個黨員。地主和反動分子的矛頭首先對中了我們三家。有一次黨員薛占英同志出外參戰，家里對地主反動分子防范不嚴，他家六歲的一個孩子就被敵人喂毒暗殺了。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由於黨的需要，我離開家到外面工作了。我雖然離開了家，但是地主反動分子却忘不了我。他們又一次想乘黨的幹部整風的機會，煽動群眾把我打倒。但是由於群眾覺悟提高了，他們的陰謀未能得逞。

一九四六年，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開展起來了。經過偉大的土地改革鬥爭，堯昌里的封建地主被徹底打垮了。薛華實畏罪逃跑；薛澤蕃罪惡重，被政府判處無期徒刑；五閻王等也被徹底斗倒。堯昌里世世代代受壓迫、受剝削的窮苦農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真正翻了身當了主人。咱家在土改中也進一步翻了身，有了土地、耕畜、房屋……。隨着農業合作化、公社化，咱家的生活也越過越好。現在的生活，你們都看到了，住的有窑有房，鋪的蓋的有毡有毯有被有褥，使的用的有縫紉機、手表、自行車……。你們都念了書，成了文化人。



这和从前比起来,真是天地之别呵!

* * *

咱家的家史,我就写到这里。你和你姐姐都已长大成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你们将怎样续写咱的家史,那就看你们的作为了。你们一定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永远跟着党走,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一点一滴的力量都献给党的事业,把咱的家史续写得更红更红。

父
李丕忠

一九六三年一月

平原插图

借了地主十五串錢以后

楊發祿

我今年四十四岁，是滑县宋林人。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时期，一家十三口只有三間破草棚，一亩七分老坟沙荒地，一条用了三代的破被子，整天过着牛馬般的生活。因为借了地主十五串錢，地主却要了我家七条人命，害死姥姥家六口人和我的姐夫；逼得我在外流浪十五年。每当我想起这些痛苦的經歷，就抑制不住內心的憤怒！

我两岁时，邻居給二哥說了个媒。那时，我們穷人家怎能娶得起亲呢？父亲和母亲再三商量，硬着头皮向地主宋老成借了十五串錢，才算把二嫂接回家。誰知道，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宋老成这十五串錢却害了我們三家十四条人命。

宋老成这个大地主大恶霸，手下有一支流氓队伍，头目就是火土匪王三祝。他們私設牢房，另立法令，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无所不为。在滑县有一句話：“宋家校場，打死人不偿命。”宋老成的儿子宋太长，孙子惠魯、方魯，就凭借这种反动势力，橫行霸道。我們庄上三条街，宋家就占了一条前街，强把庄名改为“宋林”。这里成了宋家的黑天下。

我父亲借賬时立有文書，講明一年半为期，本利还清。但

是头年八月借，过年麦季就来要了，那一年，我家和姥姥家十三口人，辛辛苦苦才弄到一石五斗麦子。宋老成带着狗腿子，一进门就对我父亲说：“新河，今年不错呀，你的账也该清了。”

父亲迎上去说：“大爷，文书上不是写的一年半期吗？到期一定送过去……”

宋老成把眼一翻说：“什么到期不到期，叫你还就得还！”两眼死盯着我们那一堆麦，把手一指：“先交这个，剩下的秋后还清！”

父亲气得说不出话来，母亲忍气吞声，苦苦哀求：“宋大爷，你行行好啊……”



宋老成一脚把母亲踢倒在地。大哥、二哥气火了，上前就想打。父亲知道宋家是不好惹的，忙把大哥、二哥拦住。宋家于是连打带抢把麦子扛走了。

我们一家的口粮被抢走以后，逼得父亲走投无路，一气之下，上吊死了。母亲领着我们上街讨饭过活。可怜我的五哥生了病，没有过冬天就活活的饿死了。

这时宋老成又在我大哥身上打鬼主意。他派人和我母亲说：“新河一时想不开死去了，很可惜。其实宋大爷是最讲信用和义气的，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你们还清了账，生活过不去还可以再借嘛。现在人死了也不能哭活，还是安排安排今后的日子吧。宋大爷知道你们有困难，他老人家又很喜欢你家玉山。宋大爷的意思叫玉山跟大少爷到东北做生意，只要他好好干，将来大有好处。”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的好心，谁不知道他们的大少爷是东北的“盐滩司令”，十个被骗出去的连一个也难回来。母亲不让大哥去为他们卖命，央求说：“大爷的‘好意’我们心里都明白，只是玉山不懂事，不会服侍大少爷，还是留在家里种地吧。”

这家伙眼看诡计被识穿了，只好说真话：“我们把话说明白了，不听大爷的话可以，不能不还大爷的账，你要放明白点，前次借的账还未清呢，限三天一定要还清！”

从此宋家一天三次来催账。我们连要饭也要不来，那有錢去清吃人的无底账？但是，“肉在虎口，势在人手”，有什么办法！到了第三天，为了一家人的活命，大哥忍痛离开我们，

到东北給宋家扛了一年半的长工,只給了一块銀元。大哥就拿这块銀元逃出来,討飯到新乡,便流落在那里。

我大哥走后,一天夜里,宋太长乘我二哥不在家,又带着狗腿子上我家来,逼我母亲清賬。其实,那是清什么賬啊,在他們大吵大嚷乱哄哄的时候,宋太长提着手枪,偷偷摸摸地把二嫂逼到后院强奸了。二嫂也投井死了。

二嫂死后,留下两个侄女和十个月多的侄子。二哥无力撫养,把两个侄女送人做童养媳,侄子給人作养子改姓张。二哥因生离死別,冤冤屈屈,气成了一个瞎子,不久也餓死了。

我們家乡是个革命根据地,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很激烈,經常处于“拉鋸”形势。我家被逼得没有办法,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三哥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被群众选为农会主席,领导农民闹翻身,向宋老成开展斗争。八路军轉移后,他們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由于叛徒告密,三哥不幸被宋家“还乡团”抓住,送到滑县城宋家队伍头目王三祝的牢房。三哥被关在黑牢里,不給吃不給喝,吊起双手,逼他供出地下組織名单。但是,三哥总是那句話:“叫我咋死都成,就是不知道!”敌人没有办法,又怕八路军回来,关了三天,到晚上把三哥活埋了。同三哥一起被活埋的还有二十一个阶级兄弟。

三哥和二十一个阶级兄弟虽然光荣牺牲了,但是,他們那种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庄上受压迫受剝削的劳苦群众,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大家更加团结,斗争也越来越艰苦曲折了。宋老成害怕革命的群众,害怕我們兄弟。于是,就进一步残杀人民,揚言和我家“势不两立”,要我們“灭門絕后”。

那时，我們家里只剩下四哥、母亲和姐姐了。宋太长把四哥抓了壮丁，直到現在不知下落。又給我母亲派捐要稅，把老人家逼出家門，一路要飯到新乡找大哥，在日本鬼子的飞机轟炸时，老人被掩埋在瓦砾堆中。

我姐姐是十五岁出嫁的，姐夫姓刘，在道口鎮宰羊杀鸡，生活顧不住，就回到我們家里来。四哥被抓丁，母亲被赶走，宋太长又来欺負我姐姐。宋太长对我姐姐說：“想死就留在这，要活就快滾蛋！”第二天晚上，这个畜牲就闖进来。强奸了我姐姐。那时，我姐姐已經怀孕六、七个月了。过了几天，宋太长又派狗腿子連打帶撵的把我姐夫一家——姐夫、姐姐和外甥赶了出来。他們沿途求乞，走到浚县，姐姐快要分娩了，便住到一个破庙里。一天，姐夫出去要飯，从早到晚，走了一村又一村，要到一杓半碗的舍不得吃，自己却餓死在路上。姐姐和外甥在庙里等了三天不見姐夫回来，就拖着沉重的身子出来找他，走不了多远，在一个桥底下临产了，姐姐暈死过去，醒来以后，才自己动手收拾嬰兒，結果得了产后风。更可怜的是这个小外甥，生下来就沒穿沒吃的，用破席子包着，到第七天就送给人家了。姐姐以后也改嫁了。姐夫这一家人，就这样被害得家破人亡，生离死別。

地主宋老成要我們“灭門絕后”，还要灭我們亲家的口。我姥姥家和我們只隔三个門，因此首先遭到毒手，被宋家害死了六条人命，也是家破人亡。

这就是大地主大恶霸欠下我們家、姐夫家和姥姥家的一笔血海深仇——三个家庭十四条人命！

我在十四岁那年，地主要派我的工，顶还父亲借的账。母亲明知那是虎口，进去出不来，十分伤心。我也清楚宋老成一家没安好心，便央求母亲放我出去逃生。母亲抱着我，哭了大半天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儿是娘身上的肉，……有宋老成在就没有我们，你一定要争口气，记着回来报仇！……”

从此，我便开始过着流浪的生活。那年年关，我到了禹县，听说风雪寺有庙会，就到那里讨饭。走投无路，我央求老方丈留我出家。老方丈知道了我的身世，说什么这是“因果孽报，劫数未了”，现在还不能出家。其实，他是害怕我牵连他。他把我送到庙里的佃户高老头家当长工。十八岁那年，他们又把我卖出去当壮丁，押送到洛阳李家楼新兵集中营。这真



是一个“閻王殿”。有一次，两个逃跑的新兵被抓回来，国民党軍官把我們押出去“訓話”說：“誰想跑就像他們两个一样泡制！”那两个穷兄弟一个被砍掉一只手，一个被挖了一只眼睛，匪軍官还說：“如果还想走，下次再砍那手，再挖那只眼。”我們想，反正在这里也是死，不如想办法逃生。同我一起拴着的十二个弟兄，夜里从窗口爬出去逃跑了。

我逃出虎口，流落到郑州，白天要飯，夜里就蹲在一家浴室朝外开的烧水爐口，过着非人生活。

一九四八年郑州解放，我才获得新生。我永远也不会忘記，郑州解放那天，我还睡在郑州北站口，解放軍一到，就发給我棉衣棉被。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一套棉衣，一条棉被。一个姓王的指导員見我没处住，把我帶到他的住所安頓下来。王指导員也是穷苦人出身，他很同情我，和我講了很多階級斗争和革命的道理，使我逐漸懂得，我的苦是剝削階級給的，是蔣介石卖国集团給的，我們只有跟着共产党，支援解放軍，解放全中国，彻底推翻蔣介石卖国集团，才能建設我們自己的新中国。我参加了郑州市搬运公司工作，不久又参加支援解放南京的担架队，直到南京解放后才回来。以后，我又被調到板桥水庫工地当搬运工人。

我从十四岁被地主撵出家乡，就和大哥、姐姐失去联系，互相都不知死活。一九五八年，在組織上的关怀和帮助下，我終於找到了他們。想不到，我們分別二十六年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又团圆了。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給我們家、姥姥家和姐夫家都报了仇，申了冤，地主宋老成依法惩办

了,并且給我三哥等重新安葬,立了碑,大侄子也回家了,两个侄女也找到了。

地主宋老成要把我家“灭門絕后”,可是,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們一家人丁兴旺,个个生活安定。一九五六年,我結了婚,有了一个男孩;我大哥一家三代过着幸福的生活。每当我想起过去,又看看今天子侄和儿孙他們幸福地成长的时候,我心里总是那么激动。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坚决听党的話,永远永远地跟着毛主席!

周光瑚记录整理

刘繼贞插图

天下烏鴉一般黑

朱 应 安

我家本是外地人，祖父討飯來到涼山六馬才落脚在這裡。從父親到我這兩輩人，經過多少奔波流離，想尋找少受一點苦的生活，可是幾十年中，東奔西逃，結果弄得家破人亡，最後還是逃回這苦寒的涼山住了下來。天下烏鴉一般黑，舊社會里窮人逃到哪裡也是受剝削階級的壓迫。說起我這一家人在舊社會里東奔西逃的生活，眼淚就包不住。人說世上黃連苦，我比黃連苦三分。

我父親叫朱二爨。祖父一死，家裡生活無着，我父親為了糊嘴，只得離鄉背井，一路討着飯到關嶺去投奔我表哥。有一天走到擺布堂寨子，正是夏曆七月十四。當時人們迷信，七月半祭祖宗忌外人。可是餓着肚子的人哪裡顧得了這些，挨到大地主文才學家門口想要碗飯吃，還沒開口，地主走出來不耐煩地說：“哼！要飯吃也要知個好歹，不張開眼看看是什麼日子，七月半忌生，不要說給飯，連水都不能給一口。”

吃飽的人哪知餓漢的飢。我父親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誰曉得這一下竟把地主惹火了，說叫化子在他家門前犯了他家的忌，拿出槍來朝着我父親這個方向“砰”的一槍，子彈从我父



亲头顶上几尺高的地方飞过去。地主恶狠狠地说：“这是警诫，下次再来，枪头低一点，要了你的脑袋！”说完，硬逼着我父亲爬着离开。父亲在地主的压迫下，忍屈含怨爬了一里多路，直到地主看不见了，才站起来赶快离开这个可恶的地方。

我父亲东家求，西家讨，饱一顿，饿一顿，走过多少无人烟的地方，翻过无数的大山，最后终于来到了关岭县的桃家寨，找到我表哥王明全。我表哥也是一个贫苦农民，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拨出他讨坡麻大地主罗希成家的一幅坡地给我父亲种。生活算有了落脚点。那知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秋收后交了地主的租子不久，罗希成的狗腿子杨正明看见我父亲生活过得去了，就借故敲詐。走进门来当头先打了一棒才问：“朱二发！你种了我们老爷的地几年了，为啥才交一年

的租子？”

父亲只有講好話求情說理。寨子中的老幼也在旁边劝解。但是有心敲詐的人，有理是三扁担，无理也是扁担三，他們扣了我父亲一个“抗租不繳”的罪名，挨了一陣枪托，还把我父亲捆起来，把家里的粮食、衣物全部搶走，然后放一把火将一間茅草房烧了。这真是惨无人道！他們还說，“这只能贖頂嘴的罪，贖不了抗租的罪”。又把我父亲押到地主的刑房吊了起来，硬逼罰款銀洋一百元。一个傾家蕩产的远方人，哪拿得出这么多錢！他們也知道鸡脚杆上是沒有油水的，目的是要杀鸡給猴子看。地主的自卫班一陣乱棒，打得我父亲皮开肉綻，渾身沒有一块好肉。他們打酸了手，就帶話給我表哥說：朱二发抗租是他唆使的。表哥王明全知道躲不了这场灾难，只得托亲借錢送給地主，才把我父亲抬回去。我父亲将息了半年身体才有些好轉。当时我父亲想，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計，既拖累了亲戚，自己也沒有出路。給表哥說清，流着眼泪离开了表哥家。但走哪里去也沒有个目标，只好到处流浪。

后来逃到断桥的戈亮去帮人。受尽了苦的人，干起活路来格外勤快，得到乡邻的称赞和同情，介紹他和一个受尽折磨的受苦女子結了婚，这就是我的母亲。只說可以安居乐业了，可是旧社会哪里有劳动人民的出路！有天我父亲去赶大水沟場，路上被国民党的兵拉去当挑伕，过了好些日子才逃回来，却受了内伤，无錢医治，不久就含恨去世了。那时我只有六个月，家里一分錢沒有，母亲把我抱在怀里，頂着一张白紙，挨家挨戶去討錢葬我父亲。走了五个寨子，共得了二十二元錢。

黑良心的剝削階級，連討來埋人的錢也要敲詐。地主袁士倫知道我母親討得二十二元錢，就派狗腿子來說：“這裡一樹一木、一土一石，都是袁家的，窮鬼葬地，老爺不發。”

我家腳下無寸土，我母親只好用討得的二十二元錢，向地主換來一塊沙土，再用一床破席子埋葬了親人。

我本來是一胎兩弟兄，我是大的。父親死后，母親討飯幫人，撫養我們兩弟兄。一個女人拖着不滿周歲的孩子，顧着幫人顧不了家裏，只好狠下心來到外面找個落腳處。她要得兩個破籃子，挑着我兩兄弟到了木扎寨，改嫁給雇工潘樹成。這樣勉強過了一年的平安日子。

繼父到下木扎幫人，又碰到仇家，正遇上羅希成的狗腿楊正明去收兵款，就把他抓去賣壯丁。母親在家裏聽到這不幸的消息，立刻趕了去。剛到地主家大門口，就聽得從裏面傳出來繼父淒慘的喊叫，看見地主的幫凶拿着鋤刀放在繼父的脖子上。我母親急得不顧一切地拚命往裏沖，前腳還沒有進門，那幫狗腿就是一陣槍托，把她打倒在地。裏面被捆着的人也想掙扎出來援救，地主的幫凶怎肯輕易放過他，當頭就是一刀。我的母親已經被打得爬不起來，看到這種情況，立刻就昏死了。蘇醒過來後，看見地主的天井裏血流滿地，不見親人，又昏死過去。我母親最後勉強走回家來，三天就離開了人世。弟弟接着也被餓死了。我的繼父到底是被他們害死了，還是當了兵，到現在也沒有音信。

有錢人家的兒女上十歲還在吃奶，一二十歲還離不開娘。窮人的孩子幾歲就云天霧地到處奔波。我母親死了以後，姑

母把我帶到她家。但她家也是白日無喂雞米，夜晚無鼠耗糧，只好托人帶信給我叔父朱玉祥（富農），講清把我寄托給他。但是，有錢人看錢如命，我在叔叔家吃了他一碗飯，等我稍微長大一點，就要我天亮做到天黑，做了這樣做那樣。可是，飯還吃不飽，天寒地凍也沒有被子蓋，在牛圈樓上的稻草窩里過冬，半夜三更叫起來也不敢不動。有天晚上叫我趕到幾里以外的地方去放田水。在路上天氣又冷，豺狗又多，一聲聲叫得根根汗毛都立起來了。回去嗎？怕挨打；去放水嗎？又害怕。進退兩難，只得到一個守莊稼的棚子裏躲一躲，由於人小瞌睡多，剛進去坐下，很快就睡着了。不曉得過了多久，一個東西突然把我弄醒，原來是一條大豺狗咬住我的左腳不放，吓得我大哭大叫，才把它吓跑。這下更不敢走了。天亮了，因為沒有去放水，也不敢回去，我跑到岩洞里躲起來，白天出來弄點東西吃，晚上又轉回洞去睡。這樣的生活過了幾天，寨子裏一個婦女去挑水，發現了我，才把我護送回家去。到家以後，前事算勾銷。但是叔娘心毒得很，立刻就交給我一根扁担叫挑水。當時我不滿十歲，挑起水桶，人家說是“三爺崽一樣高”。我挑起桶走到井邊，桶底早已撞壞了。我自己進行修補，很長時間也整不好。叔娘不見我回去就趕到井邊來，不問青紅皂白抽起扁担劈頭蓋頂就打，几下把我打倒在井里頭。幸好過路人把我救起來，倒出了肚子裏的水。等我蘇醒過來以後，才知道左手已經折斷了。可是回去還是逃不出惡婆的手，吊着一隻手，每天做活路回來還要磨一斗包谷面，搞不完就不給飯吃。我只好連夜干，天不見亮又要出山。我晚上不得睡，就偷偷到

山上去睡。只要他們看見，不是打就是罵。有天我在山上睡着了，这个恶婆不声不响地用繩子套在我的脖子上，一股劲拉到寨子門口……

头十岁的孩子怎样会犁田呢！飯又吃不飽，如何做得起这样的重活？我說了一些好話要求吃飽点再干，話还没有說完就是一頓“牛梢鞭”，打得我喊爷叫娘。从这以后，他家的手段更毒辣了，白天叫去干活，晚上还要捉三只耗子，以减少他們的粮食损失。人捉耗子多不容易！我也不得不干。有天做活路太累了，一觉睡到大半夜，沒有起来抓耗子，叔娘这个恶婆跑上楼去一把把我从梦中推下楼来，当时就跌得昏死过去。

俗語說，叫化子有三天年。但我过年也得不到一天休息。大年三十夜做活路回来，吃的是一碗冷鍋巴飯，一碗剩菜湯。我就这样眼泪泡飯过了年。年初一出山做活路，年初二才从山上轉回来，到家后在地上搽得一个粑粑，叔娘看見了就說我“偷嘴”，搽得一个粑粑就換来一頓鞭子，把嘴也撕破了，三天都吃不得飯。第四天去割馬草。每天規定四捆，割一捆过一回秤。第四次因为肚子餓了沒有割足斤数，当晚就沒有給飯吃。我苦苦哀求說：“叔叔，肚子餓得很，先給我点飯吃，再去割来补。”他嘴答应：“想吃等我去拿来嘛！”誰知他到后园舀了一瓢粪来，放在我的面前，說：“你的飯在这里！”晚上我餓得无法，只得走到隔壁田家要了一碗飯吃。这个富农叔父就是这样的对待一个穷侄儿！我实在熬不下去，第二天，穿着一件破得不能补的单衣，頂着刺骨的寒风，踏着一尺多厚的雪，十三岁的孩子，走上了和父亲一样过着住岩洞、討飯吃的流浪

生活道路。冬去春來，夏去秋至，不知過了多少飢寒交迫的日子，才奔到這抬頭望山頂、帽子就落地的涼山六馬來落腳，依舊是受剝削、受壓迫。

我原來想，自己生來就是苦命，人家說：“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滿升。”由於這種封建迷信思想束縛着我，所以在舊社會里，我沒有一點勇氣進行反抗。一九四九年我們六馬區解放了。來到這裡工作的同志第一個就找我問長問短。一個女同志看見我大冷天還穿着一件單衣，立即從她身上脫下棉衣送給我。現在我雖然有了不少的好衣服，但也沒有這件棉衣名貴。我要把它傳下去，傳給世世代代的兒孫，作為“傳家寶”。

在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我明白了許許多多道理。我知道了過去幾代人的苦難生活不是什麼命中注定了的，而是剝削階級騎在窮人的頭上製造出來的。為了推翻他們的剝削壓迫，我就聽黨的話，積極工作，參加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由於得到黨的培養，我參加了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解放這十多年來，我擔任過民兵隊長、互助組長、初級社和高級社的主任；現在群眾又選我當了涼山大隊的大隊長。我家的生活比過去不知道要好多少倍。看見了今天的幸福，我就想起了舊社會的苦難。沒有共產黨我這血海的深仇是報不了的，我這幾根骨頭，恐怕早就變成了灰。

誰要忘記了階級剝削和壓迫，誰就是忘了本。

中共鎮寧縣委辦公室整理

費聲福插圖

父子恨

张明显

在我们村子的东北角上，有我家二亩地，离我家近得就像站在脚地看院子哩。人常说：村心的院落，村边的地，是穷到骨头里也不卖的家业。我家这二亩地正是这样。尽管人老几辈，穷得要啥没啥，可谁也没有起过卖它的心意。我们不卖这二亩地，不光是因为它近、它好，是因为它养活了我家几辈人，它埋葬着我几代祖先，我们活着靠它养活，死后靠它掩身。它是我们全家人的命根子啊！

这块地正座落在大地主“忠恕堂”的庄外，和地主的地连着畔子。这真像在狼的窝口上放了一块肥肉，日夜叫人替它担心啊！

果然，事情没出所料，地主的霸权传到张日旭手里，就对这二亩地呲牙了。起初，他仗着自己有钱，企图大肚子胁人，想用钱把地从我家手里箍掳走。结果，他没弄成。

用钱买不行，张日旭就一连串使了许多歪法子欺侮我们。有一年，张日旭给他先人箍墓，拉砖瓦的大车哪儿不能走，偏偏在我家二亩地里碾了一道辙，还故意轧在我老祖母的坟上。我二爸几乎气疯了，手指着张日旭，非要和他白刀子入，红刀

子出不可。又有一年，我家地里的麦子都快熟了，地主把他家的牲口放进去，糟蹋了一大片。地主心里盘算：他这样糟蹋，弄得我有地难种，自然就会把地契送上他的四合院大门里。

但是，狗地主把梦又错做了。就在他放牲口糟蹋我家麦子的当儿，我二爸站在地畔子上，指着张日旭大声立誓说：“姓张的，你把事吃摸清白，只要我张二绝不了后，这地就到不了你‘忠恕堂’手里！”

就这样，我的父辈们和地主相持了好多年。张日旭仍像饿狼一样，对着我家二亩地眼发红。

在地主的欺压下，在苦日子的煎熬下，我爸跟我叔父一个接着一个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就在我们哭鼻子流眼泪，一次又一次埋葬父亲、叔父的当儿，张日旭一次又一次地笑歪了嘴巴，认为把地弄到手的日子一步一步地接近了。

我二爸在病危中三番五次地把独生子明玉叫到床前，叮嘱说：“儿呀，咱俩二亩地，可是咱的命根子。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可千万要给咱先人争一口气，就是咱再穷，就是他‘忠恕堂’的金子把地铺满，咱的地也不能卖给他！”

我二爸就含着这口愤气离开了人世，丢下我个十八岁的弟弟张明玉。我遵照我二爸的遗嘱，和弟弟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起。

第二年春上，家里穷得没法过活，一天两头揭不开锅，没法子，明玉给“忠恕堂”拉长工去了。明玉进地主家是有顾虑的。但是，他转念一想：我一不欠他的粮，二没揭他的债，我到他家是凭力气吃饭的，他敢把我怎样。去！要是不去做活，挣

点錢回来，葬埋父亲时借的債，指望拿啥给人家还呢？明玉是个有心計的人，这么一想，便咬着牙进了地主家門。

到地主家以后，张日旭像招待客人似的招待明玉。每頓飯都和明玉一块吃，頓頓不离肉，明玉要活干，他却說：“才来嘛，歇几天！”一連几天仍是如此，明玉心里犯了疑。这么一想，許多事情都联在一起了。譬如：张日旭經常問他：“家里日子过得去嗎？要有作难处，就先把工錢使了，咱們家可不在乎这点錢。”又常常劝他：“做人要放活些，不要像你父亲那样固执。那样于事无益，于人有損……”想到这里，明玉暗地里出了一身冷汗，知道张日旭是笑里藏刀，要謀算那二亩地，便打定主意辞了工。

“哼！这小子和他老子一样可憎。走着瞧吧，真是軟的不吃，爱吃硬的。”张日旭像恨我二爸一样，恨透了明玉。

就在明玉向张日旭辞工的时候，地主的賬房里来了两个人。一个麻秆个子，瘦猴臉，留两撇稀落落的黄胡子，一个鷹嘴鼻子，黄眼珠，年岁比那个輕些。第一个就是我二爸病危时，借給明玉买棺木錢的人。明玉一見他进来，连忙上去問候，致謝，但是还没等明玉的話說完，那人就指着张日旭向明玉說：

“明玉，不用謝我，那錢是六东家借給你的，你應該感謝他。”

这时，六东家张日旭反背着手，在屋子里踱着方步。他用狠毒的目光瞪了明玉一眼，鼻子里“哼哼”了两声。

“啊！”明玉看着张日旭，吃惊地叫了一声。他知道自己上

了人家的圈套，又馬上鎮靜下來：“那我管不着。我在你手里借的錢，就只認你作債主。”

“好嘛，那六東家今天向我要錢，我也只好向你要了。快！拿錢來！”說着，他向明玉伸出了魔爪似的手。

明玉雙眼冒火，說不出話。鷹嘴鼻子說話了：

“明玉，你這娃怎麼這樣死心眼？你有的是辦法呀，為什麼不想？你家那二畝地不是可以賣上大價嗎？”

“啥？你們，你們簡直是硬逼人哩！”明玉氣得渾身打顫。

“你說啥？你給我再說一遍，不識好歹的東西！別人替你成全好事，你反……”瘦猴臉生氣了。他從太師椅上站起來，把水煙袋往桌上狠勁一擡，怪聲怪氣地叫起來。他正叫着，鷹嘴鼻子遞了個眼色插上來：

“唉，這娃，光急頂啥用？活人總不能讓尿憋死。”

“辦法可以想，地堅決不賣，我爸臨死……”

“唉！明玉，父親的囑咐是要記住的，祖宗的氣也是要爭的。但是你得想想，咋樣才算是給祖宗爭氣：是沒錢還債，讓人吊打一頓，然後交官法辦，算是給祖宗爭氣呢？還是賣地還債，落個雖然貧寒，但卻清白，是給祖宗爭氣呢？明玉，你家人老几輩可是清白人啊。再說，你的債是葬埋父親時借下的，這是正經事嘛，不是吃、喝、嫖、賭胡花了的。就是你父親地下有靈，他也絕不會怪你的。”說到這裡，鷹嘴鼻子停頓了一下，用眼睛打量着明玉。他認為這是最能打動明玉心的話。

明玉一面听鷹嘴鼻子說着，一面懷恨地望着張自旭，回想到父親臨死時說的話：“兒呀，你要給先人爭口氣，‘忠恕堂’的

金子把地鋪滿，咱的地也不能賣給他！”明玉想到這裡，心裡越發沉重了。

鷹嘴鼻子以為明玉經他那麼一說，心裡活動了，就趁機更逼一步：

“你把地賣給六東家，既清了債，又得了錢，可以另在別的地方買地。這是一舉兩得的好事嘛。”說到這裡，他又停下來，把一個邪意的笑臉給明玉。

明玉越聽越生氣，覺得不能再在這裡呆下去了。他想出了“緩兵之計”，有意把話說得和氣了點。

果然，鷹嘴鼻子順竿爬上來：“至於你家的祖墳，請你放心，六東家絕不會動你一塊土疙瘩，這有我們作保。”

張日旭也說話了：

“這還用得着說嗎？我和明玉同姓一個‘張’字，明玉的先人就是我的先人。這不用說，不用說……”他搖著頭把“不用說”三個字，一連說了好幾遍。

“既然把話說到這，賣地不賣地可以商量。只是，你們也知道，地雖然歸我種，但與我堂兄還有些牽扯，我得先給他招呼一聲呀！”明玉說畢，轉身就要走。

“哎，得限定個時間呀。”鷹嘴鼻子還不放心。

“好，那就給明玉三天期限吧。”張日旭假裝寬容地說。在他看來，甭說三天，就是五天，你個窮鬼也想不出個啥辦法來。你跑嘛，地可是跑不了的。

.....

明玉回到家，給我把上邊的事說了，我知道事不宜遲，得

赶快想办法给地主还债，就和明玉一面变卖穷家当，一面求朋友、告邻居……想尽一切办法凑钱。

穷人都是一条心。我和明玉张罗了还没一天，本家爷爷、叔叔、哥哥、弟弟就把钱凑的差不多了。

张日旭听到风声，气得不得了，就和保甲长们串通一起，晚上把明玉拉去了。

地主的大厅房里，比阎罗殿还阴森可怕。地主、保长、甲长，还有上次逼明玉卖地的鹰嘴鼻子和瘦猴脸……坐了一大摊，一个个满脸凶煞气。

张日旭一见明玉，就恶声恶气地叫起来：

“张明玉，把你这小杂种还没看出，竟有这么大的本领！”

接着，保长说话了：

“张明玉，你答应了卖地还债，为什么又反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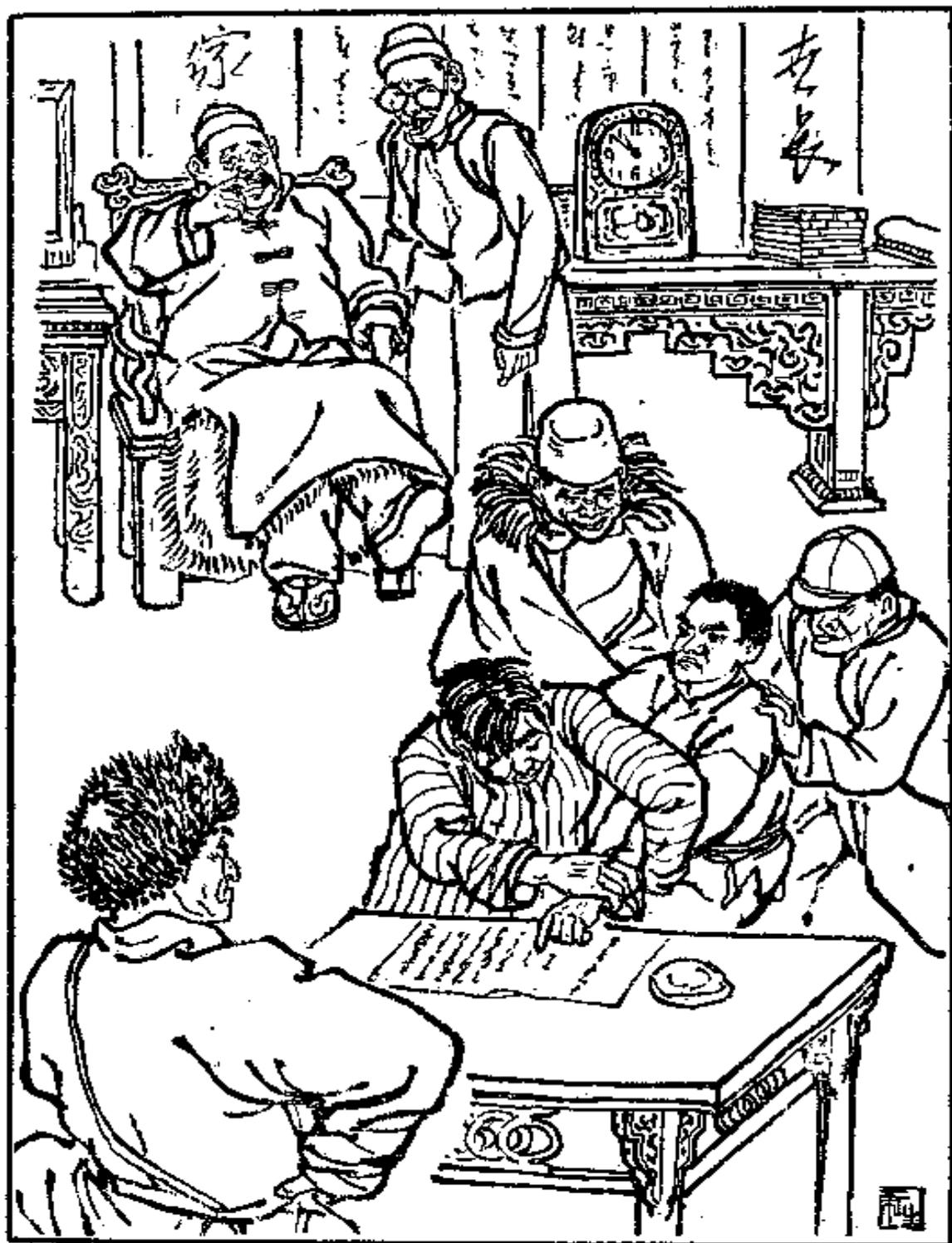
“我欠的是钱，不是地！你……”明玉恨不得打他两巴掌。

“放肆！娃子，你放明白些！今个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瘦猴脸咆哮着，从椅子上跳起来。

“哎，张明玉，你是三岁娃不懂事，还是百儿八十老糊涂了？你算不算一个人？你有没有脑袋？”鹰嘴鼻子走到明玉跟前，一句连一句地追问。

“和这不懂王法的东西说啥哩？去，把张明玉的地契给我抽了！”随着保长的喊叫，两个“跑保的”跨出大厅，向明玉家里跑来了。接着，保长冷笑了一声，说道：

“张明玉，今天给你把话说清，以后再这样胡闹，小心你的狗命！”说毕，他“啪”地一声，把一枝手枪摔在桌上。



一会，两个“跑保的”把地契取来了。接着，几个人活拉硬扯地把明玉右手大拇指，塞进印泥里，又按在地主早已写好的卖地文约上……

就这样，埋葬着我们几代祖先的二亩地，转到了张日旭的名下。

第二天，我们全家人像送葬似的，哭着给祖坟里烧了最后一张纸。看着祖坟，想起往事，想起我二爸临终时的遗嘱……无限的悲痛冲着我们的心。我们的眼泪像雨点一样洒在祖坟上，洒在心爱的地里，这不共戴天的仇恨，也深深地埋在我弟兄的心里。就从这时候起，我和明玉都得了一种叫不上名来的病：吃不下，睡不稳，身体一天天瘦下去……

不久，我那苦命的弟弟就和他可怜的父亲一样，含恨去世了。临终时，他嘱咐我：

“哥，咱这仇要报啊！”

“报仇，一定要报仇！”

……

直到全国解放，共产党来了，打倒了“忠恕堂”，斗倒了地主，我们家老几辈的冤仇才报了！

王施林整理

秦耘生插图

河 洛 田

(苗族) 王石宝

自从爷爷被“土皇帝”小罗山逼死，把蛟洞那几块瘦田也卖掉以后，我家就只剩下一块河洛田了。

河洛田水头可靠，又坐落在寨脚，肥水淌在田里，把泥巴泡得黑油油的，稍微用点功夫，收三两石谷子是容易的。那时我经常想，只要守住这块田，做好点，每年再打点野菜，挖点蕨巴来添帮添补，一家五口人的日子就能勉强混得过去了。可是万恶的旧社会，根本不让我们有安身日子过。

“狗的年”（一九四六年夏曆丙戌年）收谷子的那天，我一边割谷一边对我老婆说：“大妹家娘，今年的粮食看起来不坏，想来也该吃得上两顿饭了吧！”她说：“你不要高兴早了，再多也抵不住两回捐款！不过，管它的，只求人口清吉就行。”

正说着，小罗山安的乡长——韦德新骑着马跑来了。他来到河洛田边，挽住缰绳，站在田坎上一看，怪声怪气地说：“王石宝，你这块田的谷子好得很，今年怕吃不完吧？”

我听他那话来突然，很不自在，就随口答道：“乡长，只有出不完的捐款，哪有吃不完的粮食？……”我的话没说完，我老婆怕惹事，连忙用话岔开：“乡长，这谷子看样子好，都是些



喝了风的空谷壳，一点不饱满。”

韦德新那双死鱼一样的眼睛，连眨也不眨一下，死死的只是望着谷子，连声赞叹说：“好！实在是好！我这一弯田没有一块赶得上。唉！我过去为啥没看见呢？哼……”

说着就慢吞吞地勒马回家去了。看他这个样了，我担心要出鬼，心里有些发跳。不过横着一想，挨着老虎实在怕不了那么许多，也就罢了。

谷子刚收到家，我牵着牛去耕田，犁头还未架好，韦德新的狗腿韦老罗就跑来了。他叫着我说：

“石宝，乡长给你一百块钱，叫把这块河洛田卖给他。”

哼！果然不出我的猜想，真打起我这块田的主意来了。我压住心头的火，好好和他说：“这块田是我一家人的命根子，卖给他了，我再到哪里去找饭吃！”

他說：“沒有飯吃？只要有氣力，到處都有糧食，只怕你不願意去找。”

我氣了，馬上數落起來：“我！我們窮人一不當頭，二不當尾；不敢派人一顆糧，不敢要人一個錢；天上不落，地下不生，到哪裡去找？只有你們找得到，我們找不到。田我不賣！”

“哈！看不出你的嘴倒還硬，……我勸你放明白點，免得將來後悔。”韋老羅說完，嘴一歪，眼一扯，衝着就走了。

韋德新用盡心機，三番兩次要買我的河洛田，說好說歹我也不肯賣，這下可把他惹火了。趁着青黃不接的七月間，他叫他的保長兄弟韋德榮拿了一張派款條子來我家，硬派了我十一塊錢的槍款。這時，家中顆粒俱無，靠吃野菜過日子；有一角二分錢在身上，前天去場上買了兩顆鹽巴籽，兩頓野菜就花光了；哪裡去找那麼多錢！派款條子到手時，我馬上對他說：

“保長，家裡實在分文沒有，你緩些日子吧！”

韋德榮把臉一板：“你說的啥！分文沒有，你家河洛田收了那樣多糧食哪去了？你敢抗款，老子要你的命！”

那時是他們的天下，“抗捐”“抗款”的罪名是真能要人性命的。我左想右想，只好把喂的一只老母豬拉去賣。可是，怎麼賣也只能賣起六塊錢。我只得拿着這六塊錢又去找韋德榮。一進堂屋，韋德榮正抱著一個大烟筒在抽水烟，我說：

“保長，家裡那只老母豬都賣了，只得這六塊錢，那五塊請你讓一讓！”

“放屁！我讓了你，拿什麼來貼？”

“實在沒辦法了！”

“没办法你就不要想活！”

离了他家，我就出“大加一”的利到处去借钱。哪晓得，有钱的人都是通气的。他们知道是韦德新弟兄有意整我，谁也不愿借。借不到我又去求他。韦德荣还是那个又吼又骂的凶横样子。韦德新在一旁把眼色一递：“你给他垫五块吧！”这话一说，韦德荣马上变了话头：“好，给你先垫五块。”

我怕上他的圈套，连忙说：“我家里一点出处都没有，哪时还你呢？”

“本钱哪时还都不要紧，只要你按时还利就行。”

“那利钱咋个算呢？”

“嘿，火行大市的‘五还六’，莫非还会要你多的？”

“五还六”，五块钱过五天就要一块利钱。利这样高，还不起时还要挨利滚利。那么，不上半年我那块河洛田就要改姓了，这怎么行呢？我于是说：“这个利钱我哪里还得起！”

韦德荣眯着眼想了一会：“还不起，那你就帮工吧。”

我横心一想，帮工就帮工吧；只要你垒不起我的“閻王帐”我就不怕。

从此，我就变成了他家不要钱的长工。挑谷、砍柴、舂米、挖地……，就是长得有八双手，天天做也做不完。

一天，下起雨来了，我穿的是件肉都包不住的破襟襟，韦德荣还是要我上山打柴，风刮雨淋，浑身发抖，出外不久就着了凉。后来，我想发点汗，就摸到牛圈楼上的草窝里去睡觉。不提防，牛伸嘴扯草吃，把我的腰带襟襟从楼板缝中拉下半节去吊起，在风里摆来摆去的。韦德荣的老婆走到圈边，一看，

吓的直往后退，退到院坝，一跤摔在地上，把背上的娃儿摔得嘶声呐叫地大哭起来。

韦德荣把她拉起来，她脸青面黑地说不出话，只伸手往圈里指。韦德荣连忙回屋提枪，赶到圈门边来一看，马上认出是我的腰带。这一下，他把我抓下楼来，说我把他老婆吓掉了魂，随手拿起一根柴棒，打得我周身是伤。这一来，病上加伤，我一直睡了十多天才起床。大概是韦德荣向他哥咕噜了什么吧，这天韦德新跑来问我：

“王石宝，你家里还有几个人吃饭？”

“连我有五个，你又不是不晓得！”

“你来帮我兄弟了，哪个在家做庄稼？”

“做，别说了，妈老了，娃儿又小，婆娘又经常害点病！……”

“那，你为啥不把河洛田卖了，还清账回家呢？”

“老人们留下的只有这点命根子了，再卖了吃泥巴也无处抓。”

“那么，他那五块钱你哪天还呢？”

“保长说过，叫我帮工作利，本钱慢慢还。”

“唉！”韦德新倒叹了一口气。他这一叹气就来了另一个毒计。

过了几天赶狗场，韦德荣忽然假仁假义地说：“王石宝，你有好久没去赶场了，今天我放你去赶一回场，早去早回来。”

确实有好久没去赶过场了，听他这一说，我就蹩着脚，真去赶场，哪晓得才走到场上，韦老罗、韦老开就扛着两支枪追

来了。他們二話沒說，一索子把我捆了起来。

回到他家門口，韦德荣鼓起那对牛眼睛，拍脚打掌地說：

“王石宝，老子晓得你不是好东西，你把我哥的钱偷到哪里去了，快快拿出来！”

我說：“保长，这真是白肉上生疔，你家哥的钱在哪里？你咋个知道是我偷的？”

“放在哪里，在柜子上的，二十五块钱；不是你偷，还有哪个偷？”

我心头火冒，一句话冲出口来：“你家柜子上有个鬼钱，鬼才得见！”

韦德荣把牙一咬，一把拿过韦老开手头的枪，对住我的胸口一连挨了几枪头子。他边挨边罵：

“你不老实說，老子一枪就把你敲死在这里！”

我心头一横：“要打要杀随你便，我不背这个偷名！”

“好，他还嘴硬，跟老子把他吊起来！”他这么一吩咐，韦老罗們几个坏家伙就把我拴吊在房角角那棵梨树了上，离地悬空有一人多高。

韦德荣認为这下我不敢嘴硬了，抓起一根青杠棒，走攏来吓唬道：“你承認不承認？”

我說：“見都沒有看見，有啥承認的？”

韦老开在一边作好作歹地說：“你快承認，我求保长把你放下来。”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韦德荣見我这样，乒乒乓乓地在我脚上插了几棒。我还是

咬着牙不哼一声，他又下命令了：

“还不承認，跟老子站上去！”两个狗腿爬上树去，一下子站到我的肩上，痛得我眼睛一陣黑，恍恍惚惚就不省人事了。

等苏醒过来，睜眼一看，我躺在地上；滿身骨头骨节像針扎着一样痛，一动就察察的响。几个背“通火棍”的守在我身旁，见我活过来了，有一个就說：“你承認了吧，家里还有老母亲，有婆娘、儿女。”另一个說：“錢是小事，不要拿皮肉受苦！”还有一个說：“快承認了，不然还要挨吊！”我張嘴好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韦德荣又由屋里跳出来：“不要讓他松动，还是跟我吊起来！”

就这样，以后我一天要被吊三次，打三次，死三次；心里啥也沒想了，只想到一个死。

吊打了两天，我一点松动的口风也沒有。韦德荣急得干瞪眼，只得又开个門路。这天他吩咐他的狗腿說：“韦老开，王石宝偷盜，是他房族接盜，你們去叫他們快来办交涉！不来，就先把他全族人的猪、牛、馬擄光了再說。”

“是！”几个狗腿像奉了“圣旨”一样，一窝蜂似的奔向我們卡塞高寨去了。

我三叔王老务、堂哥王文德見到狗腿們那副凶相，又听他們說：要把全寨的东西擄光，就被吓住了。几个老头子提了一壺酒，捉了一只鸡，包了三块小洋，忍气到韦家弟兄那里去講和。他們答应賠韦德新二十五块錢，韦德荣才把我松了綁。索子一解，我連站也站不住了，三叔們赶紧扶着我，我才沒跌

倒下去。

韦德荣装模作样的吼道：“王石宝，二回再偷，枪毙了你；连你房族都脱不了身！”

“哪个偷？……”我刚勉强提气回答了三个字，三叔他们连忙挡住我的话，拿些赔礼话去说。

韦德荣眼珠子转了几转，说：“你欠五块钱，偷了我哥的二十五块；再罚你七十块，合共是一百，限你十天一起还清！若是还不清，要你的狗命！听见没有？”

我听到“一百块”“十天要交清”，马上明白这是比着河洛田做的圈套，抱了两下头，提起神说了几个字：“我拿不起！”

这话一出口，强盗头子韦德新竟亲自出马了：“拿不起？你那河洛田我就出过这个数。没钱就拿田作抵！”



“那块田呀，你休想！……”

韦德荣这时又顿脚臭骂起来。韦德新摇摇摆摆走到我三叔身边去，轻声地说：“王老务，这事弄不好我就找你！快滚回去吧，明天回我的话！”

到家已是夜深时分了。三叔噙着泪劝我说：“么！算了吧，穷命还是穷命，给了他就算断了祸根。”

“兄弟，天下是人家的；三叔说得对，早给早脱祸，反正留着那块田也保不住不餓飯。”堂哥王文德也这样劝说。

我长长叹了一口气，沉默了好半天，只得包住眼泪点了头。就这样，河洛田連契約都沒写，就成了韦家的产业了。我心里实在不甘，吊打都沒哭，这回却在家哭了一个整天。从那时起，我就成了个更穷的穷光蛋；又餓又操心，人也一天一天瘦下来；得了一场大病，脚就蹩得更厉害了。只要一走过河洛田的田坎边，我的眼泪就包不住。我恨韦德新兄弟，恨不得吃他們的肉。那时候，我暗下里听得有人说，麻山一带有个帮工出身的熊亮臣領着一帮穷人在“鬧事”，专门打富济貧，尽找凶人恶人开刀，和当年来过的紅軍差不多。我們四大寨也有些穷人跑去伙他拖队伍去了。我听了真想跟他們去，去投奔这个熊亮臣，将来好报仇雪恨！无奈我的脚蹩了，心想去脚不讓去。我左想右想无奈何，只得把这仇恨記在心里；我天天都在咒，做梦都在想：“你們这些吃人的老虎老豹不要狠，总有你們挨炮挨刀那一天的！等着吧！”

刘昌藩整理

平原插图

忆苦思甜

全国烈军属模范 刘玉秀
昌乐县冯宋公社寺后大队

我今年六十六岁，经过了清朝、民国和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算是走了三个社会。想想我年轻的时候，再看看如今的青年，真是天上地下。你看，今天来开会的女同志也都能写会记。这在俺那时候做梦也不敢想呀！

我从小跟娘要饭。记得九岁那年，要饭时叫地主的恶狗拖倒，头上咬了个大窟窿，昏了过去，醒过来才知道娘把我撲在怀里哭的死去活来。要是现在，谁受了那么重的伤，还不得赶紧送医院，好生养上几天！可是那时穷人别说治不起，连在家里养伤都养不起，一天不去要饭，就得歇起牙来。我十二岁上，娘为了叫我出去混自己的嘴，送我到俺庄大地主刘乐仁家抱孩子，抱了十天，就挨了地主老婆三次打，最后一次打的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把个笤帚疙瘩都打断了。您道为的什么？就是为我去解溲时把她孩子放在地上站了站。我哭着跑回家去，俺娘见了心痛，去找她说：“俺孩子犯了什么大不是，你把她打得那个样？”地主老婆把眼一斜楞说：“你爱来，打死活该。”旧社会穷人谁敢惹财主，俺娘回来含着泪劝我说：“孩子，咱穷人命薄，你还是去抱吧？”我哭着说：“我不，跟娘去

要飯，叫狗吃了也不去了。”

还是我九岁那年，过年的时候，家里一点吃的也沒有了，沒奈何，我爹托人找保借了地主刘乐仁家两吊錢，粿了点高粱，摻上菜熬了一鍋粥，年三十夜里点上灯，一家人围着鍋喝了。俺兄弟喜的了不得，滿街和人說：“俺家过年点上灯了，还喝了粘粥。”那知道，借了这两吊錢，全家人就掉进苦海了。两吊錢在地主的算盘上利滾利地长起来，到我十五岁的时候，滾成了二百吊。地主逼着还賬，还不上就要俺那間小屋来抵。那是間什么屋啊！除了个小炕剩不下多大点地方，晚上睡覺，一家八口人头和腿在炕上，腿和脚都得伸在墙上。可是这这么个放要飯棍的地方，眼看也要保不住了。我爹实在沒办法，打譜把我卖了还賬。那时我已經懂事了，哭着不願意。爹两眼含着泪劝我說：“孩子啊，不是爹狠心，卖了你把咱这間破屋保住，往后你要是能回来看看，俺都出去要飯了，你还有个等等的地方，要不，你上那里去找你的爹和娘啊！”过了几天，把我卖給了一个四十七岁的老头子，他来相我时，我身上还没有件褂子，俺姊妹好几个在一起，人家問是那一个，俺爹就說是光着脊梁的那个。又过了几天，爹到婆家去拿錢，头一趟，爹帶回一百吊銅錢，沒进庄就讓地主的狗腿子截了去。俺娘一看他空着两手回来了，就問：“咱卖了閨女，你怎么一个錢也沒拿回来？总得讓閨女吃上頓飯再走啊！”第二趟去时，爹从卖我的錢里，像偷别人似的拿出两吊，埋在村外沙滩里，背着地主买了点粮食回来。狠心的地主一查錢不够數，又派狗腿子到俺家把煎餅鏊子揭了去。我出嫁以前，娘用那点粮食熬了



一鍋粥，兩手哆嗦着給我盛上了一碗，說：“孩子，喝飽吧，這是你那血和肉啊！”我听了，哪能喝下去，嗚嗚地哭，一家人哭成一堆……我走后第四天，娘就活生生地惱死了，撇下个刚会說話的小妹妹无人照料，只好給了人家。又过了几年，爹、妹妹和兄弟也都餓死了，还有一个兄弟后来也被国民党杀了。俺娘家就这么家破人亡絕了戶。

婆家和娘家一样穷，过門三天就断了頓，我又拾起了要飯棍。男人典种人家二亩薄地，出力不小，見不着什么，收点粮食不够給官府納捐納稅的。保长、甲长常上門催，說什麼：“鍋底下沒长蜘蛛网就得拿。”以后就連这二亩地也沒有了。說起那穿的来，就更沒法提啦。过門时我穿着一件褂子，就是这么

一身，再沒有件替換的了，脏的实在沒法，就在黑夜脫下来洗洗，不等干，第二天再穿上。进了腊月門，我还是这一身单褂子，出去打水，大娘孀子們見我冻的“哧哧哈哈”地怪可怜，对我婆婆說：“花那么些錢买了来，看別把她冻煞。”婆婆到我小姑家去討来了个旧棉袄表，还舍不得給，現把她身上的一个穿了十多年的补釘罗补釘的棉袄表替下来給了我，又去求亲告友討了点烂棉花套子叫我絮起来。我一个十五岁的孩子，那里会做，把烂棉花鋪上，一翻滾成个蛋了，一面做着一面噗嗒噗嗒掉眼泪。邻居一个大伯嫂子可怜我，帮着我翻了过来，又給我引了，怎么觉着挺硬的，扎不进針去，一看原来是我的眼泪把棉花都湿透了。她叫我晒干了，好歹帮着我做起来。別看这个棉袄破的不像样，我穿上可是很知足。过門以前，我有八年沒有穿过棉袄了。如今我听到有的青年妇女埋怨花布不够穿的，就对她們說：“你們这是生在福囤子里了，可別不知足呀！我那时候，想打个补釘上那里討換去！不錯，那时候的布倒是尽着买，可是穷人沒錢不也是干瞪眼呀！”这正应了那句古語了，“一个大錢一斗谷，沒个大錢愁的哭”呵！

如今兴婚姻自主，青年人太幸福啦！这样的好日子我可是一天也沒捞着。我过門的时候才十五，俺男人四十七了，比我整整大着三十二岁，說他是我的爷爷也有人信。刚到他家，看見他那个胡子拉杈的老样，吓的我直哆嗦。可是他也是个受了一輩子穷的好人。他长到十八岁了，还不知道穿鞋是个什么滋味，冬天赤着脚給地主放牛，牛拉了屎，就赶紧把脚插进去暖一暖。二十八岁了，還沒說上个媳妇，財主們嘲笑他

說：“这家人家放枪有地方，放爆仗沒有地方，眼看就要穷断根了。”他憋着股气下了关东，在大森林里伐木头放排，拚死拚活干了十八年，攢了几个錢，回来典了二亩薄地，又买了我，就花光了。当时有人劝我說：“你跟了他，要人沒人，要日子沒日子，图什么！不如趁你还年輕，早早跑了另找个主，要不他半道撇了你，想再找个主也沒人要了。”我心里想：“他也够苦了，我要是跑了，他不得苦煞。”我聽了命，死心和他过下去。可是左思右想，觉得活着实在沒个盼头，夜里眼泪止不住地流，把枕头湿的漉漉的。

說起我从前受的苦来，真是再說上两天两宿也說不完。我这一輩子生了七个孩子，共合只吃了六个鸡蛋。生了孩子不到三天，就得拉起棍子出去要飯。要点东西自己还舍不得吃，省着来家侍候婆婆，侍候孩子。我生最小的孩子时，家里什么也沒有，有一天，餓的实在沒法了，他爹用了两个銅板去买了三条黄瓜来家。人家告訴我，月子里不能吃凉东西，可是我哪顧得这些！我的七个孩子，叫日本鬼子給害死了四个。老三死那年就十六了，他去給鬼子打差，叫二鬼子一杠子砸到要紧处，回家当天就死了。第四个死的时候才五岁，是跟着我躲鬼子藏在河沟里时，他餓的哼哼哭，我怕叫鬼子听見，連累着別人，就用手給他捂着嘴，沒想到，鬼子也过去了，一摸孩子也憋死了。第五个孩子是他爹背着躲飞机，跌倒摔死的。要是他們現在活着的話，也都长大成人了。我这活着的三个儿子，也是从旧社会刀山油鍋里逃出来的。老大，能給人家干活掙口飯吃了，就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解放的前一年，他开小

差跑回家，一連躲了半年炕洞，这里躲躲，那里藏藏，直到咱八路軍来了才敢出来，而后参加了咱自己的队伍。老二，志气大，他十四岁那年就离开了家，临走时和我說：“娘，咱穷人在家里也沒有出头的日子，我出去当兵吧，看看誰的队伍好就跟誰干。”一去十多年沒个音信，我只当他不在，沒想到解放后的第二年他从貴州捎回信来，这才知道他已經当了咱人民解放軍。小的今年才二十五岁，头年才从部队复員回来。

我常和些孩子們說，咱們这家人，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早不知道死在哪里了。解放了，咱不是从地上上了天，是从泥里上了天。我觉得毛主席比亲娘还亲，亲娘在旧社会里被地主逼得沒法还卖了我，只有共产党才救了我。我听党的話，我和毛主席一条心，我家里挂了三张毛主席像。我做飯看見咱毛主席，想起过去的苦日子来，一柴一米，一根洋火也要節約。黑夜点起灯来看見了毛主席，觉也睡不着，光想起来干活。秋收时队里叫我管場，天不亮我就起来扫場、压場，等社員們起来时我早就干完了。我今年自己就掙了一千五百工分，自己掙的两个人吃不了。队里的四家“五保”戶，我也常去照顧他們，过年时我都是先去帮着他們包完了餃子，再回家包自己的。有些人劝我說：“你是軍属，又这么大年紀了，該別人照顧你呀，不要再出那么大的力了。”我說，不行。毛主席号召咱要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別看我老婆子，只要能动弹，我就得照毛主席說的去干。

費声福插图

一个破皮袋

安有良

家中連續來信來電報，催我回去結婚，組織上知道后，主動准了我的假，催我回家。

到家里一看，嘿！新房已經收拾得整整齐齐。阿媽指着炕上的緞被子和案板上的吃食對我說：“有良啊！看看這些，想想過去，要不是解放了，要不是公社化，那能有這樣的好日子？咱家世代代，誰結婚有過這樣的好鋪蓋呢！”阿媽把我拉到炕上坐下，“孩子，你還記得解放前我領你討飯，被狗咬傷的事嗎？”說着她眼里流出了淚水，到上房里顛巍巍地拿來一個破皮袋。我看了激動地說：“媽，這不是咱們過去討飯時用的袋子嗎？你到現在還保存着？”媽說：“孩子，我保存下這個破皮袋，為的是叫你別好了瘡疤忘了痛！要永遠記住在舊社會咱家過的苦日子，記住今天的舒坦生活來得不易，好好聽毛主席的話，保衛大伙的幸福日子。”我雙手接過破皮袋，不由得千仇萬恨再一次涌上心頭。解放前，那悲慘、痛苦、血淚斑斑的往事，又一幕一幕地在眼前出現……

地主一把鉄算盤 算盡窮人血和汗

我家祖祖輩輩給地主扛活。那時候，拚死拚活地干上一

年，到头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我家在大通县药草乡，山上荒地很多，只要你有力气，开多少都有。我三岁那年，爷爷决心带上三个儿子和儿媳妇上山开荒。可是，开荒种地要农具、种子，一家人还要吃饭，家里穷得连一粒粮食都没有，怎么办呢？只得硬着头皮向地主马步长求借，黑心肠的马步长满口答应借给我们，说好秋收后和我家对分粮食。从此，我们一家人没日没夜地在山上开荒，汗一把、血一把地务劳着庄稼。老天不负苦心人，庄稼长得一片油绿，爷爷满是皱纹的脸上，出现了从来未有过的笑容。一家人也都高兴地盼望着丰收。

秋收了。黄灿灿的青稞发出诱人的香味，全家人望着场上快入仓的粮食，忘掉了一年的疲劳。不料，这时马步长带着他的狗腿子来了。他阴险地向爷爷笑着说：“收成不错啊！”

爷爷赶忙陪笑说：“托您的福，还可以，您的那一半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给您送去。”

马步长说：“好呀！”回头命令他的狗腿子：“给老头子算算，一年来他们用了我的农具、种子，加上借的口粮，连本带利共多少。”

狗腿子打开账本，算盘珠劈劈拍拍响了一阵，啊！我家打下的粮食还不够还他的一半。

爷爷一听就急了，说：“原来不是讲好收下来对分吗？咋有这样高的利？不对吧？要是这样，咱一家人就没法活了！”

狗腿子把眼一瞪说：“怎么不对？你嫌利高，当初就别借，谁给你说过收下来对分的话？”

父亲和伯父也气愤地说：“原来掌柜的当面讲好对分，现

在咋又变了卦，要講理嘛！”

馬步长一听上了火，恶狠狠地說：“什么講理不講理，你欠了我馬家的債，就得按我馬家的規矩还！告訴你，粮食不够用地頂，地不够再用家里的东西頂。”

說着就叫狗腿子装粮食。几个狗腿子一拥而上，除把粮食全部装走外，还把我家仅有的一条牛也牵走，一对柜子也弄走了。全家八口人一年的血汗，就这样眼睁睁地被地主的一把鉄算盘算得干干净净。伯父、父亲和叔叔当时怒气冲天，要和馬步长拚命，爷爷含着泪把他們攔住說：“別去送命了，这世道，豺狼当道，还是忍着点吧！”旧社会，穷人受了欺侮就是沒处去講理，叫天天不答，呼地地不应。爷爷一气，得了重病，沒几天就离开了人間。



全家九死一生 父亲被逼出走

这一下，家里連鍋都揭不开。沒有办法，伯父和叔叔都各自找生路去了。沒多久，馬步芳匪帮抓丁，又派上了我父亲，甲长說不去就要交三匹馬，我家哪里来的三匹馬呢？就是三只小鸡也沒有。为了躲避抓丁，父亲成天藏在地里，可怎能躲得过呢？甲长带着馬步芳的黑狗子来抓人，見父亲不在就抓住我狠打，叫我說出父亲藏在哪里。我忍着痛不說，但父亲还是被他們搜了出来。黑狗子用皮鞭狠命地抽打父亲，他的左手指被打折了，又被黑狗子一脚踢倒在木桩上，左胸被木桩扎了一个大窟窿，鮮血直流，昏死过去……。

从那天以后，父亲成天迷迷糊糊地躺在炕上，伤口流着脓水，痛苦不堪。我和阿媽每天去挖些野菜，勉强充飢。这样过了半年多，我父亲总算九死一生，好起来了。为了养活一家人，他不得不把仇恨埋在心头，去給馬步长扛活。白天給地主家干活，晚上就用地主家的农具上山开荒。到了年終，馬步长說我父亲种自己的地誤了他的工，不但不給工錢，还将我家地里收的粮食搶走了一半，說是頂农具費。有一天父亲见我餓的直哭，在喂馬时偷了一点馬料給我吃，被地主发现，便将他毒打了一頓，父亲受不了这种欺压，只得拋下家里人逃走了。

旧社会人不如狗 血泪仇一定要报

父亲逃走後，家里怕地主要人，阿奶只好去依靠伯父过活，阿媽領着我带着一个破皮袋流浪在外，靠乞討过日子。要

的多阿媽就吃一点，少了她就全給我吃，自己吃野菜。晚上我們睡在干水沟或山洞里。一天，我們到一個村里去要飯，走到地主門口，一只大黃狗忽地扑出來，咬住了阿媽的腿。這時，門里走出一個地主狗腿子，他惡狠狠地說：“咬得好！窮鬼，誰叫你来要飯，快滾蛋，这里狗吃剩的也不給你！”說完，把狗叫回去，“嘯”一聲關上門。飯沒要上，反被狗咬傷。可憐的阿媽傷口流着鮮血，我們空着手回來了。剛到山洞口，她再也走不動了，倒在地上，我拉着她好不容易才爬進洞里。這一天沒吃飯，又走了許多路，我餓得伏在阿媽身上哭，阿媽拉住我的手說：“忍下吧！等明天媽給你要去！”第二天，阿媽的腿腫得有碗口粗，動也動不了。可是不懂事的，還哭着向她喊餓，阿媽安慰我說：“好孩子，媽今天不能去了，你自己去要吃吧！”我



一想到地主家的大黃狗和狗腿子，就吓得說：“媽，我不去，我怕……”媽說：“孩子，馬步長害得咱家破人亡，此恨此仇一定要報，我一定要把你帶大。你不去，要餓壞了，誰替咱家報仇呢？”接着她又說：“去吧，別到大戶人家要，到窮人家裏去討上點。早些回來，晚上有狼。”

過了些日子，阿媽可以走路了，她拖着病弱的身子，我們又串東闖西，一家一家的討要。在苦難的日子里，這個破皮袋一直伴隨在我們身邊。直到一九四七年七月，父親才從外面偷偷跑回來……

* * *

一九四九年，青海解放了，我們窮人才算真正見到了天日，在黨的領導下斗倒了地主馬步長，人民政府依法槍斃了這個惡霸地主。我家分到了房子、土地和牲畜，接着組織起互助組、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立了人民公社，過起幸福生活來。

阿媽說得對：“好了疤痕不能忘了痛”。一個破皮袋再一次點燃起我滿腔仇恨的怒火。今天，美帝國主義還霸占着我們的神聖領土台灣，瘋狂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蔣介石匪幫想窺犯東南沿海大陸；國內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滅亡，總是企圖復辟，我一定要牢牢記住毛主席的話，握緊手中武器，提高政治警惕，保衛社會主義建設，保衛我們的幸福生活。

孫汝蘭記錄整理

董洪元插圖

卖身文契

李焕清

一张卖身契

我从入伍的那天起，在军人登记表上一直这样写着：韩文清，山西省沁县人……。

其实，我知道沁县并不是我的故乡，我也不姓韩。但是，我的故乡在哪里？我的生身父母在什么地方呢？这一连串的问题，就像一堆解不开的疙瘩，一直在我心中悬挂了三十多年。

一九六二年春天，我意外地接到沁县的一封来信，拆开一看，啊！原来是我的卖身契！它是用朱砂红纸写成的，因为年代过久，红色已经变成了猪肝色。卖身契上的墨迹清清楚楚，就连上面盖的两颗方形印章也清晰可辨，一颗是“山西沁县乔村村长图印”，一颗是“山西沁县乔村村副图印”。我拿着这个旧社会吃人的罪证，不由得急急默念起来：

立卖人契文字人张文善，系直隶代（大）明府原城县西河在（寨），年遭荒旱，衣食所迫，难以度日，无

奈将自己本身名教(叫)小二情愿卖与韩兴盛名下作子,以承宗主嗣后,同人说合得过大洋五十元整,其洋笔下交清,两出情愿,并无返悔。日后倘有人找信,有卖(人)契作証;口说不(无)凭,立卖人契为証。

民國拾捌年二月二十六日

立卖人契文字人张文善(手印)。

同公証人乔村村长、村副(图印)

同說合人王福、王丙和、王阳、田存盛(划押)

我讀完这张卖身契,心里充滿了悲憤。这里提到的人,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韩兴盛是我的养父,他是一个穷苦的老人,已去世三十年了,王丙和是乔村的土豪劣紳,王阳是乔村的恶霸地主,其他我都不知道。尤其是张文善这个人,他是什么人?怎样卖我的?我的身世又是怎样的?对我說来还是个謎。

去年九月,我去北京开会时,組織上批准我去我家,在政府的帮助下,找到了我那受尽苦难的亲生父亲,看見了哥哥、姐姐。这才把我悬挂在心中三十多年的疙瘩解开了。事情发生經過是这样的:

我的故乡是河南省清丰县城南五里的李家庄。我的生身父亲叫李金魁,在我被人拉走前,家中除父亲外,还有母亲、哥哥、姐姐,大小共五口人。父亲是个勤劳的木匠,有一手好手艺;母亲是个紡紗的家庭妇女,从我記事起,她沒有离开过紡綫車。可是,尽管他們沒日沒夜地辛勤劳动,在那人吃人的旧

社会里，仍然无力养活自己的孩子，姐姐几岁就当了童养媳，我从五岁开始，就同哥哥一块开始了乞讨生活。每天跑到县城去捡西瓜皮、烂白菜叶，乞讨大户人家的一口洗锅水来维持生活。

记得在一个严冬风雪交加的早晨，母亲叫醒了蜷缩在一起的我和哥哥，爱怜地对我們說：“好孩子，起来吧，进城要点东西吃。”

我和哥哥望着寒风呼啸、大雪纷飞的旷野，谁也不吭声。母亲看着枯瘦如柴的我和哥哥，她没有力量再叫我們起来了。她沉默了一会，看看冷冰冰的锅，又看看我們，最后还是鼓起勇气說：“孩子，去吧，媽給你們穿上衣裳。”

哥哥是懂事的，他知道母亲的难处，就把我拉起来，穿上破烂棉袄，朝着县城走去。我們好几天都要不着东西！这样的大冷天又向哪里去要呢？我和哥哥跑了大半个城，什么也要不着。为了争一点人家扔到臭水沟的烂白菜叶，我們和一些穷孩子打起架来了。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們全家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父亲眼看无法活下去了，就背起木匠工具含着眼泪对母亲說：“孩子的娘，你在家好好拉扯着孩子，我出去挣点钱，叫孩子們吃个饱。”

从此，父亲就离开了家乡。

抵 債

父亲走后，我們娘儿三个靠着母亲的一架紡綫車和我們

哥儿俩乞讨来的残汤剩饭，过着最艰难的日子，日夜盼望着父亲能够挣点钱来养家活口。

时间过了一年光景，大约是阴历十一月间（一九二八年），突然一个人找上了我家门，这人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年纪五十上下。现在我才知道，他就是我的卖身契上的那个“立卖人契文字人”张文善。

他闯进我家门，就瞪着凶恶的眼睛问我母亲：“这是李金魁的家吗？”

母亲听到父亲的名字，心想是父亲托人捎信来了，连忙回答：“是。”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张文善掏出一张纸条，交给我母亲说：“这是你男人的借据，他欠我大洋二十元，上面写得分明，如若不能按时还债，情愿将小儿抵押，他现在无力还债，我来领小孩子。”

母亲顿时惊呆了，她一把拉过我，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眼泪像泉水一样地涌了出来。

“我的孩子不能给你！”母亲悲愤地说。

“那好。”张文善冷笑了笑，说：“俗话说得好，夫债妻还，那你就还钱吧，我限三天。”他说完，甩甩大袖子就走了。

隔了不久，张文善又来了。这次他把我本家叔叔也找来了，逼迫母亲立即还债付息。否则，就要告官府打官司。母亲、叔叔百般哀求，也毫无结果。叔叔见没有办法，又怕打官司，就对母亲说：“孩子留在家里，也是挨饿受冻受苦，不如放他去听天由命吧。”

张文善也皮笑肉不笑地对母亲说：“你就放心吧，孩子留

在我的身边，我一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他說了一番，掏出一个白面餅子給我，又給我套上一件半新半旧的小褂，不等母亲同意，拉起我就走。

母亲看着自己的亲骨肉被夺走了，跑上去撲着我，亲我的小脸，哭着說：“我苦命的孩子，你娘对不起你啊！”在母亲哭晕了的时候，张文善就把我从母亲的怀抱中夺走了。

被 卖

这一年我仅仅六岁，新的苦难又开始了！

我离开母亲以后，张文善把我带到了大名府原城县西河寨（今山东省館陶县）。我的父亲就在这个地方为地主做木工。可是，他辛勤劳动的结果，不仅沒能养活家小，反而欠下了債，最后被迫把自己的亲骨肉抵押給人。

在张文善家里，我記不清住了多久。我很想念母亲，整天啼哭，他打我、罵我，吓唬我說：“小崽子，再哭我就杀了你！”当时，我虽然不懂事，但是，我知道打罵的痛苦滋味。因此，我有泪不敢流，有声不敢出。記得到张文善家里不久就是春节，富人家的孩子无拘束地欢鬧玩笑，而我像囚徒一样地被关着，过着如同牲畜一样的痛苦生活。

春节过去了，张文善把我放出了籠，对我說：“小二（他給我起的名），我把你送回家去。”我真高兴极了，带着渴望重見母亲的心情跟着走了。

我不知道在路上走了多久，不知翻越了多少大山，走过了多少河流。最后来到一个村庄，这就是山西省沁县的乔村。

张文善把我关在乔村土豪劣紳王丙和宅旁的一間小土樓上，地上鋪着一堆乱草，寒风从土樓的窗洞里吹进来，渾身就像刀割一样。夜里，我蜷縮在乱草里睡，白天，我有时啼哭，有时爬在窗洞边看看街上的行人和玩耍的孩子，盼望着人們送点东西給我吃。

张文善从把我关进小樓后，很少进来。大概是怕我跑了或餓死，有时也送点吃的給我。这里的穷苦人們見我可怜，有的送点飯給我吃。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穷苦的老人，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媽媽，他們几乎每天都来看我。有一次，老媽媽还特意送来白面餅，一面看着我吃，一面擦着眼泪叨念着：“可怜的苦命孩子，哪一輩子造下的罪啊！”

我在土樓上大約住了五六天，漸漸地病倒了。不久，老媽媽把我接回家，一口湯一口飯地喂我，老媽媽把我当成了亲骨肉，我也把她当成了亲媽媽。

老人的苦难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当时我不知道。我在韓家老爷爷和老媽媽的撫养下，漸漸长大起来。他們为啥撫育我呢？直到这次找到了我的卖身契，我才算明白了。

韓家老爷爷和老媽媽，是乔村貧苦的人，老两口有一个閨女，早就出嫁了。他們唯一的財產，是二亩半薄地。两位老人听說我是被人出卖的，一心想救出我，但是，他們沒有力量，也沒有錢。乔村的恶霸地主看出这点，于是，就抓住了这个发财的机会。王丙和、张文善和乔村的村长、村副互相勾結一起，

給韓兴盛老爷爷出了个主意：由恶霸地主王阳借給韓兴盛老爷爷錢，把我买下来。这就是卖身契上写明的那个“大洋五十元整，其洋笔下交清”的事实。而王阳借錢的条件是以韓家老爷爷的二亩半地相抵押。

韓兴盛老爷爷买下我，他的灾难更大了。两位老人为了还債，尽管起早貪黑地劳动，結果，他們辛苦劳动一年的收成，大部要交給狠心的地主王阳，作为“大洋五十元”的利息。两位老人本来就很有貧苦，这样一来，更是苦上加苦了。当我十二岁的时候，也就是到韓家的第六个年头，韓兴盛老爷爷担負不起这样的重債，終于劳累而死了。在我和老媽媽埋葬老爷爷的时候，王阳就把我們的二亩半地全部夺走了。

从此，我和老媽媽就一无所有了。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呢？老媽媽到处求亲告友，好歹租了地主二亩地来种，可是，每年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要交地租，我和老媽媽累死累活，也无法生活。我到十六岁的时候，实在无法活下去了，就对老媽媽說：“媽媽，讓我出去吧，我到外边掙点錢来养活你。”

老媽媽見我在家也要餓死，含着眼泪答应了。临走时，她还对我說：“孩子，別惦記我，我年紀大不中用了，你好好去混碗飯吃吧；記住經常給家打个信。”

我告別了老媽媽——我的第二个苦难的母亲，走出了家門。但是，我却沒有想到，这一次分別，竟又是像我离开亲生母亲一样，与救出我的、千辛万苦把我撫养长大的母亲永別了。

进了地獄

我离开家門，四处奔走，急于掙点錢养活我那受苦的母親。可是，“天下的穷人一般穷，天下的地主一般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里向哪里去掙錢呢？我奔走了几个月，不但沒有掙着一个錢，就連自己也得不到温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我闖进了狼窝，当了国民党的壮丁。

在国民党匪軍里，我受尽了人間少有的折磨和痛苦。我当兵几个月，身上就布满了皮鞭、皮带、皮鞋的伤痕。每天不仅挨打、受罵，还吃不飽飯，不久，我就被折磨得病倒了。記得，我在病中，一个人躺在潮湿的草鋪上，誰也不来过問。

在我暈暈如死的时候，匪連长命人把我拖进了破庙，当作



死尸处理了。可是，我没有死，我又苏醒了过来。从此，我便下决心冒死逃出这人间地狱。一九四一年秋天的一个黑夜，我终于和几个同伴一起，脱离了这个世界万恶的狼窝。

走向幸福

我从国民党匪军逃出以后，参加了我们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从此，结束了自己的苦难生活，真正回到母亲的怀抱，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党的亲切关怀与教育下，我很快提高了阶级觉悟，认清了我们的阶级敌人。一九四二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一九六二年九月，趁我去北京开会的机会，党组织特意批准我去找家。我便根据卖身契上的线索，来到山东省馆陶县西河寨，我把来由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该村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很同情我，热情地帮助我四处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拉我抵债又把我转卖与人的张文善（已死）的弟弟张正善，他今年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从他那里我才知道：我家是在河南清丰县，父亲名叫李金魁。但是，我家是在清丰县什么地方呢？因为岁月已久，他也记忆不起来了。党支部书记为了帮助我找到更可靠的线索，又亲自召集全村年纪大的人开座谈会，最后，才打听到我的老家在清丰县的李家庄。我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了西河寨，匆匆地赶到河南省清丰县城关公社李家庄。县公安局为了使我能顺利地找到家，还特地给我写了介绍信，公社党委专门派通信员小李领我去李家庄。我一走进庄子，怎样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不禁喊了起来：“家，这



就是我的家！”呵！它完全变了样，和我童年时代的故乡，完全是两个世界啦；过去衣衫蓝衫的人们已换上了新装；村前那个臭水塘，如今清澈见底，一群鸭子自由自在地浮在水面上，相互追逐嬉闹着，眼前呈现出一幅农村丰收的图画。当时，我以迫不及待的心情，跨进了家门，第一个见面的是我的堂哥，他毫不犹豫地高声喊道：“焕喜（我的乳名）你还活着呀！”当我和从小就当童养媳的姐姐见面的时候，她含着热泪讲述了分离后苦难的遭遇；在当时痛苦的生活逼迫下，母亲在我走后的第三年就去世了，父亲带着我的哥哥到关外逃生去了。现在，他们定居在黑龙江省林口县六合村。以后，组织上又批准我到黑龙江去和父兄重聚。

现在，我的哥哥已经有四个孩子了，生活得很幸福。父亲今年虽然已经七十五岁了，可是还很健壮，能做一些轻微的活

儿。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孩子，咱们有今天，全是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啊！”他不愿意再提过去，一提起来就悲痛不止。

我看到父亲今天的幸福，更加怀念我死去的母亲和养父养母，他们能够活到今天，看看我们的新中国该是多么好啊！

董洪元插图

沒有共產黨哪有今天的我

黃寶珞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號，我突然收到福建農學院的來信，打開一看是一份聘書。原來農學院聘請我做教授。我當時心里亂了一陣。你想，我認得沒幾個字，做什么教授？大概是他們把聘書寫錯了吧？我趕緊拿着聘書去找在我們這里實習的一個農學院同學，他對我說：“真的，我們學校要請你去講課。你有很豐富的實際經驗，我們很需要這樣的專家呢！”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來復去睡不着。一個普通的農民，以前連書都念不上，現在却要去給大學生講課，坐在台下聽的人都念過很多很多書，……

我出生在一戶很貧苦的農家。從七、八歲起便開始看牛，幫田事。家里米缸底經常朝天，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用稀水粥來度過，更說不上讀書了。一大早我騎在牛背上出去，看見那些和我年紀差不多的孩子，都穿得整整齐齊的，背着書包上學校去，心里真有說不出的羨慕。我想，我要是也能像他們那樣去上學，那多么好啊！有好幾次，我下決心回家要和父親說，可是一到家里，看見父親那苦苦的臉，看見擺在桌上的三粒浮、四粒沉的稀粥，只好把話吞下去了。

家里沒有人識字，那真苦！有一年，我爹到林浦地主六磨家里交租，地主欺侮我們不識字，故意給我們多算了兩百多斤。地主家里算盤打得嘩嘩响；我父親呢，不識字，不會算，只能用瓦片在牆上划行行。等到交完谷子，我父親發覺自己的份幾乎都沒有了，臉吓得慘白，趕緊對着牆上划的行行搬手搬腳的算起來，才發覺被地主多拿了。第二天清早父親趕到地主家里去算賬；地主連理也不理，只拿出那張記數紙抖了抖，大模大樣的說：“白紙上黑字，錯什麼！”父親怕因被他收回，不敢和他爭。我們一家只好圍在一起哭了大半天。這樣的事情不止一次呢！我母親那時不懂得地主狡猾，不懂地主剝削我們的道理，她總是說：“這就是我們不識字的苦啊！”

到我十歲那一年，母親想讓我去讀書；父親說：“我們現在一家干活都不夠吃，還讀什麼書！不識字只好不識字啊！”母親哭哭啼啼的和他吵：“就是餓死，也要讓寶洛去讀書！我們這一輩嘗夠了苦，要讓孩子將來有個出頭啊！”我也吵吵鬧鬧的要去，旁親戚們知道了，勸我父親說：“哎啊，讓孩子去吧，將來也有出頭的日子！”我父親被這麼多人一說，再想想不識字的苦處，只得答應了。他緊緊的摟着我說：“寶洛，不要怪你父親，不是做父親的不肯讓你去念書啊……”說着眼淚簌簌的流下來。我心里真難過。

到了正月，我父親咬緊牙關，向放高利貸的借了八十斤谷給我做學費，送我到鄰村去讀書。我在家里算一個勞力，這一走，許多事情還能不積下來？所以我白天听课，晚上還得幫助家里做事，不能溫習功課。要是到了農忙，干脆連課都不能上

了。有好几次，我刚刚走到学校，家里就托人叫我回去了。你想，这个样子能讀出什么来？

在我十二岁那年，哥哥没法在家里生活下去，跑到长乐做长工；父亲为了一家人能有几口米湯喝，不得不这里求求，那里借借。有一天父亲对我說：“宝洛，这样下去也不成事，你不会讀出多少字，家里田事又誤着，我看你的書就索性放下吧，我們不是讀書的命啊！”說着，他連連叹气。我知道家里的苦，沒話說，咬着嘴唇答应了。那天晚上，已經很迟了，我們还没有去睡，沒声沒息的坐在那里，每个人都有說不出的难过。母亲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把我拉到身旁，叫了一声“宝洛”，眼泪便一下子流下来了，不成声的对我說：“宝洛，你就勤紧做两三年，等你哥回来再去讀書吧！你不要难过，怪都怪你爹媽沒本事啊……”

我那时想：这一生和書本是沒有緣分了，要讀書，就等下一世吧！真的，以前穷人家孩子要認几个字是不容易的。……

我躺在床上，愈想心里愈不平静。像我这样一个以前被人家看做是“臭牛屎”的孩子，今天能够做到这个样式，怎么能不感謝共产党、毛主席呢！我再想到，今天，党給我一个任务，要我去教書，我能够不去嗎？当然不能。我一定要去教，而且要教得好好的，来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給我的大恩情！

想到这里，我翻身起来，点了灯，决定立刻动手写講課提綱，要准备得很有把握的去講，才能講得有条有理。

但是，写什么呢？我拿着笔伏在灯下一直想。叫我講理論，我实在講不来；要講就只能講我所熟悉的、所做过的事情。



我拿穩了筆，在簿子上歪歪斜斜的寫下“水稻豐產經驗”六個字。我決定要和同學們談談怎樣選種，怎樣密植，怎樣防倒伏，怎樣利用淺水灌溉……主意一定，便在簿子上寫下“我……”但只寫這麼一個字，我的筆便突然停住了。

說句實在話，我一開始種田，就很注意怎樣把田種好。我

們租六磨那五畝多田很壞，產量很低；我經常想，這几畝田要是產量能提高，我們生活也許會好過些呢！所以一有閑，心里便在盤算，想辦法。我那個時候決定要多施肥，想肥料一多田一定就會好起來；可是，我們這麼窮那裏有錢買肥料？只好自己積肥，每天很早起來，到路上去拾牛屎豬屎；平常稍稍有一點空，便帶了土筐，到一里外的地方去，把土一担一担的挑回來，這樣辛辛苦苦的搞了不知有多久，那瘦死死的田，才漸漸肥了過來。同時我很注意選種，平日間經常在田里巡視，一看見有硬硬粒多的穗便摘了來，揀了又揀，一年一年的培育着，好容易過了几年，所有的田才都播上這種好種子。

那一年，田里肥下得多，又全部選用好種，經過一番精耕細作，稻子長得特別好，整整齐齐的看過去很爽快。同村人看見都稱贊我，很多人還向我要好種子。我們全家都在暗暗高興。

可是，歡喜沒過悲又來了。快收割的時候，地主來這里巡了一巡，看稻子長得好，笑眯眯地點點頭。這頭一點，鬼主意便來了。第二天，他對我父親說：“你那五畝多田……我要收回去了！”我父親吓了一跳，接不上氣的說：“怎麼，我們種得好好的要收回去？我們又沒有欠租啊！”六磨冷笑了一下，說：“田是我的，我要給誰種就給誰種！”說完轉身走了。我們全家真愁死了。你想，田要是被收回去，那明年吃什麼？最終，我父親只好想法，用一担多的菜和馬鈴薯做人情，托六磨的一個親戚去疏通一下。六磨說：“講句實在話，我那好田，給別人賺，至少可以多租四、五百斤……現在這樣吧，給你們面子，假使



你们也肯加租,这块地就再租给你们吧!”我们那时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承受下来。我父亲连连叹气对我说:“宝洛,你不要费神了,田种好有什么用,做半死还不够地主加租呢!”其实,那个时候,不要父亲说,我自己也够扫兴了。有个晚上,我在房子里愈想愈气,便把桌上一杯选好的种子倒到窗外去了……

解放以后,我才又开始细心的试验起来。你想,田是人民的了,不好好干,还想什么呢?一九五一年,我们閩侯专区开了一个评种会,我被评了第一名,政府表扬我,还奖给我一架崭新的水车。我心里真感动。我们党和政府真是太好了!这

以后,我的劲头更大了,想尽办法进行試驗,提高水稻产量。政府真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每年单单农貸就有一千元左右,我們要什么肥料,政府就拨給我們,像五八年我們搞高产田,政府单是过磷酸鈣就拨給我們一千两百多斤。政府知道我在搞試驗,还派了許多干部来帮助我。像有一次,我选南特号时遇到一个困难:拣不出穗子中的紅粒,省农业厅派了一个同志下来帮助我,結果我們南特号选得很成功。党和政府不仅在物質上支持我,在精神上还给了我許許多多的鼓励,从解放到現在,我被評了十七次劳模,参加过全国劳模會議。

真的,我自己知道,要是沒有党和政府的領導和鼓励,我是什么也做不出来的……想到这里,我便把簿子上的“我”字划掉了。我想,那天站上台去,第一句便應該对同學們說,“一切成績都属于共产党!要是沒有共产党和毛主席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黄宝洛……”

練尚高整理

平原插图

从“苦菜花”到女主任

柯紅花

不知往日苦，怎知今日甜。我在旧社会里是个童养媳。解放前，在苦日子里滚了十八年，直到解放以后才真正过人的生活。如今，生活是越过越甜了。

逃出狼窝 掉进虎口

我老家在淳安县麻皮村。我阿爸八岁就给地主看牛，直到二十来岁，从来没有拿到一元工钱。有一年快过年了，我阿爸的裤子破烂得实在不能穿了，就去向地主要几块钱，想做条裤子穿。地主不给，他和地主争吵了几句，地主拿起刀就要杀我阿爸。我祖母怕我阿爸性命难保，就把家里的一床破棉絮给了他，又塞给他两只破碗，要他带着我姆妈连夜出门逃命。我阿爸和姆妈翻山越岭，逃进了昌化和淳安交界的大山里。在大岷坑山窝里，碰上了一户也是几年前从别处逃出来的农民。劳动人民的心是相连的，他们看着我阿爸和姆妈无处安身，就让他们一起住了下来。三年以后，我阿爸打听到我祖母饿死在家里了，也不敢回去料理后事，深怕那个地主还要杀他。

山窝里前前后后又逃来了十多户人家。大家开了一条通到石瑞(大岷坑山下的一个大村子)去的小路,还到反动派的乡公所去报了“户口”。谁知这样一来,好比羊群自己送进了虎口,伪乡长、伪保长看到山里住的这批人可欺,就七捐八税地尽往我们村里派,还要拉挑夫、抽壮丁,闹得村里鸡狗不安。更可恨的是石瑞的地主汪贤发,买通反动政府“趁火打劫”,硬说大岷坑的山全是他家祖传的产业,逼着全村要年年向他缴租。从此以后,我们村里的男人年年都被抓去做挑夫,时间长的一出去就是大半年,短的也有四五个月。家里六谷种不下去,租子又重,生活一年比一年难过。我七岁那年,阿爸无法养活一家,只好狠着心把我卖到了淳安。从那以后,我就掉进了火坑。

打死我也不要逃

“天下乌鸦一般黑”。财主的心是一样的狠毒。我被卖到



这家人家以后，他們要我放两只牛，还要斫柴。每天吃的是萝卜、洋芋，夜里就睡在稻草堆里，盖的是破麻袋。一年四季鞋子也不給我穿一双，冬天上山放牛还是赤着脚。这些倒还不要說起，每逢牛放得不好，柴斫得不够，公公婆婆就要毒打，有的时候还把我吊起来打个半死。我受不住苦，几次三番往娘家逃。可是每次总在半路上就被抓住，他們一路上用柴梗夹头夹脑乱打，还用脚乱踢，說什么：“你逃上了天，也要把你捉下来种到地里，看你有多少本事！”

后来，我婆家看我老是要逃，就把我送到了离我娘家有一百六十多里路的他們祖家安坎村。到了那里以后，生活更加苦了。吃的只有野菜、番薯叶，打、罵、餓、吊成了“家常便飯”。我十二岁那年，正月初五村里祭祖，宗祠里分来的几个包子放在楼上忽然不見了。他們一定說是我偷去吃了，拿起刀来要杀我。亏得邻居求情，才免了一死。可是等邻居一走，他們就把我吊了起来，用三根細竹捆在一起，往我身上乱打。打到后来，竹子都碎了，我的手指被打断，全身是血，只是大口大口地往外吐气了，他們还恐吓我說：“要是敢出去講一声，哭一声，就把你杀掉！”

到了十四岁那年的秋天，我害了麻疹，烧得厉害，躺在稻草堆里爬不起来。他們不光不給我吃飯，連热水也不讓我喝一口，还要逼我上山去斫柴。我爬到山上，肚餓口干，只好爬在溪边，喝些溪水充飢、解渴。第二天，麻疹就全都发出来了，一連几天高烧不退，他們把我看得比一条看家狗还不如，讓我躺在稻草堆里死活不問。这一病，病了半个多月。要是沒有

隔壁的童养媳銀凤常常烧些水給我喝喝，偷偷地拿几块六谷餅給我，恐怕我餓也要餓死了。

病好以后，我的头发都脫光了，十四岁的人瘦小得还没有人家八九岁的姑娘大。这样的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不管会不会被他們捉住打死，在一个晚上，我逃出了門。那天晚上，下着毛毛雨，我餓着肚皮，大路、村庄不敢走，路上停也不敢停，翻山越岭，赤着一双脚走了两天两夜，才逃到了大峴坑。我走进自家大門，叫了声“姆媽”。姆媽看着我脫光了头发，穿着个破麻袋，瘦骨嶙嶙，呆了許久，簡直不敢相信站在她面前的就是她亲生的大女儿。直到我告訴她我就是卖在外面的紅花以后，她才“哇”的一声，抱着我痛哭起来……

过了不久，我婆家派了六七个人追来了，逼着姆媽要人。要是不把我交出，就要把姆媽吊起来。这时候，我阿爸被抓去当挑夫了，姆媽一点办法也沒有，只好求他們不要再打我，讓我跟他們回去。

回去以后，他們果然不大打我了。我正觉着奇怪，为啥他們的“良心”会一下子变得这样好？有一天，我斫柴回来，銀凤暗暗告訴我，我公公要把我轉卖掉，那个买主已經来了。我悄悄走进家里，果然听到他們講定我的身价是十六担谷子，还約定第三天来抬人。天哪！財主的心多狠毒啊！当天晚上，乘他們一家睡熟以后，我就不顧死活地往家里逃去。

阿爸和姆媽听我一說，赶忙把我送到山下藏起来，托人找了份人家去当佣人。



阿爸累死，哥哥病死，

卖了三个妹妹还不够还债

阿爸把我送下山回到家里的第二天，就被抓了夫子。阿爸这一去，三个多月没有音讯，直到腊月二十五，才从安徽屯溪逃到了家里。一路上他忍饥挨饿，风吹雨淋，担惊受怕，回到家就一病不起。一连六天，连药也没有吃到一帖，到年初一下午就去世了。不久，我哥哥也得了病，家里同样没有一个钱给他请医、撮药，就在我阿爸死后不到四个月，眼睁睁地看他也死去了。我哥哥跟着爹妈在世上过了十六年苦生活，死了以后衣服也穿不上一件。这苦楚，现在的青年人怎么能知道？人家常说“祸不单行”，谁知道我阿爸、哥哥的棺材债还没有办法还，保长又派来了捐款，要我们一次交清两担谷子。这好比晴天霹靂，把姆妈吓得昏了过去。地主、保长是不管我们死活的，眼看着我们连饭都没得吃，还是天天逼着姆妈拿钱出来。姆妈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硬着心肠，像从自己的身上割肉一样，又把我的三个妹妹卖给了人家。可是谁又能想到，卖女儿的谷子还不够还债、缴捐！

姆妈做了一世人，入土时还是穿条破裤子

姆妈带着我们几个弟妹，吃一顿、饿一天地在苦日子里打滚，又熬过了两个多年头。到了一九四八年的秋天，我们欠下的债利上滚利，已经滚到了四十多担谷子。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姆妈就抱着我最小的弟弟，带着我大弟弟和小妹妹到

淳安姚山塢去幫地主家打山核桃，想賺點錢養家。大約過了半个月，有一天夜里，我弟弟回到家里，說姆媽得了重病，要我馬上去一趟。我等不到天亮就趕去了。誰知道她在我弟弟走出門不久，就咽了氣。我走進門，只見妹妹和小弟弟正撲在姆媽身上嚎啕大哭。我看看姆媽，她的褲子已經破得不像樣了。她做了一世人，連結婚時也沒有穿過一條好褲子，我們怎麼忍心看她穿條破褲子入土啊！可是我們哪里又有給她替換的衣褲呢？我淌着眼淚，脫下了身上的單褲（這條單褲比她的也好不了多少），給她換上。

我們在姚山塢是外地人，不要說沒有棺材，連抬尸首的人也找不到。我姆媽在那里幫工的那戶地主，非但不理，還不准我們把姆媽葬在他們村子里。正在這萬難的時候，我打聽到我們村里的呂嫩青也在这个村上打短工。我帶着弟妹找到了他，一齊跪在他的面前，磕着頭，苦苦哀求他幫忙。這才把姆媽抬到荒山里去安葬了……

姆媽死后，那戶地主不但要我們當天離開村子，還將姆媽打短工賺來的几担山核桃偷了去。我們這几个孤儿只好餓着肚皮，一路上哭哭啼啼地回昌化去。回到家里以後，我帶着弟妹妹辛辛苦苦地把六谷收了進來。誰知道担子剛挑進屋，就被地主汪賢發派來的人搶走了。家里一點吃的都沒有了，弟妹妹成天嚎哭着喊肚子餓。

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叫我們怎能生活得下去！沒有辦法，只好以很高的利息，又托人向地主汪賢發去借了兩担六谷，勉強挨日月。

旧社会,我只是朵“苦菜花”

新社会,劳动人民掌天下

第二年(一九四九年)九月,毛主席的队伍来了!我们从此见了天日,苦日子熬出头了!

提起解放前的苦,村里人都说我“柯红花、柯红花,旧社会里只是朵苦菜花”。真的,解放前,我们劳动人民谁还不是路边的草,水上的瓢(浮萍),任人践踏,任风雨吹打。可是,看看我们家现在的生活呢?我两个大弟弟,在公社里劳动,去年都结了婚,住的是新造的楼房,家里用的都是解放后新办起来的家具,他们有呢制服,有雨衣,有皮鞋、球鞋、手表……粮食一年到头吃不完。我小弟弟现在读高中。卖掉的三个妹妹,解放以后都回到了家里,现在各人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我自己呢,生活上的变化和大家一样,就不用详细说了。我要说的是,像我这样一个几次三番死里逃生的童养媳,解放后当过人民政府的副乡长,到省里参加过劳模大会,现在是县人民代表、人民公社的副主任,管理着人民自己的大事。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大翻身,这一切不要说想都不敢想,恐怕我的骨头早已经埋在地下变成灰了。

革命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加倍努力

我姆妈死的时候,还只有三十多岁,她的一生吃尽了苦头,从来不知道“甜”是啥滋味!我今年也三十一岁了,前十八年是在“地狱”里过的,要不是共产党领导我们得到了解放,一

定也像我媽媽一樣。解放後的十三年，和過去比起來，已經是過着“天堂”一樣的生活了。我想，要是再過三十年，我們的子女也到了三十歲的時候，黨中央和毛主席所提出來的、我們全國農民盼望很久的農業現代化的目標，大概早實現了，那時候，我們的生活又會變得多么美好幸福啊！

我是土地改革的時候參加革命的。那時候，我們的生活還很苦，可是我們不怕少吃缺穿，餓着肚皮受着凍照樣干。有時候到區里、縣里去開會，要走上幾十里、百把里路，鋪蓋一背就走了；碰上下雨、下雪的日子，照樣赤腳穿草鞋趕路……為什麼能這樣呢？因為我們心里很明白，過去赤着腳、餓着肚皮，受罵挨打，還得忍氣吞聲地給地主上山放牛、斫柴……現在為了勞動人民翻身，打倒萬惡的地主，建立人民的天下，吃點苦算得了什麼！毛主席發出走公社化道路的號召以後，我們更走上集體化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啦！

讓我們大家記住往日的苦，多多地想想和學習革命前輩的革命精神，在黨的領導下，努力工作，努力勞動，爭取更甜、更美的日子早日到來！

賈建虹記錄

董洪元插圖

血海深仇

——霍丘县李家圩地主庄园罪恶纪实

胡 羊 刘名泉

现在的年轻朋友们都是在五星红旗下，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成长起来的，当我们在革命前辈们所创造的幸福环境里生活、劳动的时候，可曾想到过过去？想到父兄一辈人，在罪恶的旧社会所受到的剥削、摧残和蹂躏？想到反动的统治阶级所种下的血海深仇？这里，我们将十多年前地主庄园李家圩的种种罪恶纪实如下，请大家看一看，地主阶级是怎样剥削和残害农民的。

一部血腥的发家史

李家圩这个地主世家，像一条毒蛇一样，年年月月吸吮着农民的血汗。李家占有的土地，跨两省（安徽、河南）、占三县（霍丘、颍上、金寨），曾经挂过“双千顷”（二十万亩）的牌子。财主们自己夸耀说：“马跑百里，不吃人家草，人行百里，不走人家田埂。”“千千万万的穷鬼们，头顶李家天，脚踩李家地，身住李家屋，喝的李家水。”从霍丘县的石店镇向北数，九个大小集镇，李家要占据一半以上，开当铺，搞作坊，办钱庄，设粮

行……一切剝削投机交易，无所不干。

李家弟兄，他們在反动政府中是政客，在軍界是地方民团的头目，在江湖上是土匪，在工商界是投机商，在地方上則又是封建豪紳。他們盘踞在李家圩这个封建堡垒，像一座大山重压在劳动人民的头上。

有万貫家財的李家圩，究竟是怎么起家的呢？

李家圩地主世家的家譜，充滿血腥味，是杀人起家，搶夺起家的。李梦庚祖輩李图南，在清朝时，是封建会道門（三番）的头目。十八世紀的五十年代，当地农民不甘于奴隶的生活，在太平天国旗号下揭竿而起，打官府，杀富济貧。就在这个时期，李图南效忠于皇朝富紳，帶領一批番会里的亡命之徒，对起义农民大肆屠杀，成千上万人头落地，血流成河。李图南这个劊子手，因而得到清政府的重賞，踏着起义农民的尸体升騰起来，一下被封为县官。此后，他到处貪污勒索，大量买田置地。更毒辣的是，他伪造了許多田契，私盖上官府的大印，将当地参加太平軍的农民的土地，全部吞霸去了。

李梦庚的父輩，更是凶惡。号称大老道、二老道、三老道（人們已記不清真名），在朝廷是貪官污吏，在地方是霸王盜匪。二老道在阜陽三里灣任卡官时，黎民百姓称他是“銅錢做的心腸”，人們恨他，扎草人焚燒来咒詛他。干了几年卡官，买的田地，从潁上到三河尖，一直連到河南省的边界。

李梦庚这一代，从他祖先手中接下了血淋淋的屠刀，又加厚了重利盘剝的賬本。一九三一年，党领导人別山一带农民起来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的烽火，燃燒到李家圩附近。

李家圩地主世家的子孙，为了巩固他們的封建統治，勾結反动政府，組織了地方武装，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鎮压，一次就杀死紅軍和家屬六百多人。前面走着“鏟共”团，后面就跟着李家圩的倒算队，沒收土地，搶走浮財。就这样，李家圩的土地又扩展到金寨县境。李家圩，这个地主世家，就是在成千上万人死亡、破产、逃荒中，发起家来的。

一笔笔敲骨吸髓的剝削賬

糧食登場，
眼泪汪汪，
东家逼租刮干淨，
卖儿鬻女去逃荒。

从这首民謠里，人們可以看出，当地农民在李家圩的盘剝下的悲惨生活。

农民一年辛苦换来了好收成，自己一点也享受不到丰收的喜悦。李家圩的地主却忙得不可开交，看棵定租、跑庄逼租的狗腿子們，像魚网一样撒开了。对于李家圩这批差使，农民得花血泪来应酬，設酒杀鸡，像上客那样对待，如果稍有怠慢，得罪了他們，看棵的会把租子定得高高的，叫你剩不下粮食，跑庄的逼得紧紧的，叫你透不过气来。而李家圩在佃戶繳租的时候，却搞得那么喜气洋洋，披紅鳴炮。交租的人，成担成担、成車成車的汇集来，比赶会的人还要多。这样的情景，得延續一个半月，直到寒霜降临时为止。李家圩五个大仓库装

得滿滿的，每一年都得吞進十萬担糧食。

李家圩的剝削賬，重得挑不起，多得算不清。農民交了糧食，租債却遠遠沒有完。接踵而來的是要副業租，一個庄頭（佃百畝田為一個庄頭），得交三只三斤重的雞，一只八斤重的鵝，四十斤重的羊；用李家石碾、池塘的還要交“碾雞”“塘魚”。農民交來的雞鵝羊魚，重量只能超過不能減少。地主家少奶奶坐鎮押收，輕一兩也要退回。貧農王老三因為交的一只鵝是公的，惹怒了“少奶奶”，鵝被摔死了，人還挨了一頓毒打。地主的奸狡刻薄，竟到如此程度！

李家圩的租項名目繁多。打了稻子，剩下的稻草，農民也不能全部享有。按照規定，每逢十月初一，李家祭祖那天，每個庄頭，每個佃戶，都得交“草租”。這樣，一畝田又刮去了一斗糧食。像寄生蟲那樣生活的地主，有什麼不是靠剝削佃戶得來的？連家里掃地用的掃帚，刷鍋用的刷把，都要列入租項。

交了租子的農民，回家座席未暖，狗腿子又找上門來，催人去給地主家做雜工。殺雞、宰羊、腌菜、紡績，甚至清掃廁所。每年單殺鵝腌制，得二十多個勞力，白白干半个月之久，有時連碗飯也不給吃。

一切剝削者都是貪得無厭的。就在千家萬戶愁春荒的時候，李夢庚又站在“李家圩佃戶分布圖”前，伸出罪惡的手，盤算着下一年每個庄頭要增收多少糧，盤算着利用春荒開倉賣糧，再撈上一把。

於是，李家圩新的剝削賬本立出來了。開倉賣糧的告示一貼出來，傳到方圓百里之外，連附近河南省的人民也聞訊趕

来。“为了救急救贫，赶春荒之际，开仓卖粮，价廉利薄……”
价廉？——要比收粮时贵两倍！利薄？——借一斗还两斗。
人们为了生存，总不能眼睁睁着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活活被饿死，只得咬着牙齿，狠着心肠，吃这含有血泪的粮食！

李家圩佃户们是怎样度过那难耐而悲惨的岁月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看一个普通佃户——王庆堂被弄得家破人亡的事实吧：

一九四二年是个大旱年，这个年头，“穷人吃黄连，地主加囤圈”。王庆堂带着家里老老少少，顶着太阳，披着月光，大人担水桶，小孩拿水瓢，一棵一棵，一壠一壠，抗旱保苗，全家日不歇，夜不眠，盼望着到秋来少减一点产，留一点口粮，全家度命。谁知道用汗水换来的几十担粮食，自己却落不到一粒。粮食一登场，保丁要税来了，什么壮丁税、“戡乱”税、人头税……折合十担稻。接着，地主狗腿子十几个人来押收了。管账的拿着红珠算盘，催租的有的提着枪，有的拿“黑心斗”，“三下五除二”地算开了：

——租子三十担

——欠债六担，一年，利加利，利滚利合十八担

——草租二担五

狗腿子大斗量，大秤称，实收四十担粮食，全部抵租押债还不够，还要欠下十多担。

狗腿子李介佩恶狠狠地說：“按照李家的規条，欠租十担以上者，以浮财抵押，要不然就带人进法院，王庆堂，这两条路子，由你选择！”

王庆堂一听冷到心窝，像有千斤铁锤突然压上心头，一下倒在地上，泪水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往下流，双手抱着李介佣的腿，苦苦哀求道：“老天在上，给我们一家老小留个活命粮吧！……你让我去求求李家老爷！”

“哼！求求李家老爷，老爷子说过了，少一粒租子，剝你一层皮！”说罢，一脚将王庆堂踢开。手杖一挥，“清浮财押租！”

打手们像强盗一样，闯进了王家，逃走了粮食，牵走了耕牛，扛走了水车、门板，……王庆堂一家老小在哀哭，狗腿子连头也没回，扬长而去……

第二天，狗腿子奉命来通知王庆堂：“收回佃田住屋，扒锅封门，滚蛋！”

就这样，王庆堂一家被洗劫得干干净净，留下的只是这无依无靠无生路的几口人。



王庆堂含悲忍泪，跑到李家圩求情，六奶奶手捏佛珠，听也不听就浪着鼻子說：“我們李家积祖宗阴德，做事理寬义到……”她把嘴一歪，使动了狗腿子，一掌把他推出了門外。

王庆堂气急交加，悲哀万分，頓时感到天在下塌，地在旋轉，当他定住神时，李家圩的黑漆大門已經紧紧关上了，只有一条恶狗在警視着他。

不久，王庆堂的母亲、妻子和哥哥，在焦急中害病死去；因为生活所逼，王庆堂只好忍痛将两个小女儿卖給人家当童养媳。嫂子只得去討飯，八口之家，只剩下他和一个四岁的小儿子了。

王庆堂一家只不过是李家圩所有佃戶中的一个縮影。現在的馬店公社西圩大队烟楼生产队三十一戶中，当年被李家圩盘剝得傾家蕩产的就有十二戶。

地主欠下农民的血債数不清

“宁走乱坟堆，怕走李家圩。”从群众这两句話里，可知李家圩的阴森可怕。

李家圩有軍隊，最多时有一营人，最少时也有一个連，这些看門狗，白天保家，夜晚外出搶劫；有政权，区政府就設在他家，四胡子李松泉和六胡子的儿子李煥球相繼担任区长；有法庭，家內設有刑房，有踩杠、老虎凳等刑具。李家圩从上勾通伪省政府，三胡子李梦庚一下混上个省参議員。至于保长、甲长，大都是李家的孝子賢孙。李家圩地主們凭着这些势力，騎在劳动人民头上行凶作恶。

在李家圩的庭院里，有一棵古老参天的栗树，它是恶霸地主罪恶的见证；同时，也是劳动人民饱受折磨的见证。在这棵树上，吊打了无数无辜的百姓。佃户汪从伦因为重租重税，逼得全家无法生活，有时外出做点小生意。李家圩的狗腿子们硬说他不务正业，“私通八路”，把他抓来，反捆双手吊在树上，脊背上还绑着一块石板。六胡子儿子拿着皮鞭，恶狠狠地指挥狗腿子说：“打，打不死这些穷鬼们，保不住李家圩！”皮鞭、竹条，像雨点似地落在汪从伦身上。竹条打断了，血滴在地上，人昏死过去了，他们在汪从伦头上浇盆凉水，等醒过来，又继续毒打……

圩里，栗树上汪从伦在惨叫，他的妻子儿女跪在圩沟外面，哭声震天。回家后，汪从伦身体残废，不久就死了，留下妻子儿女，无法在李家势力范围内生活，只好离开祖居，流浪乞讨。以后，谁也没再听到她们母女的下落！

李家圩内经常传出凄厉的惨叫声，这都是穷人家的亲骨肉在遭受折磨，有的已在那人间地狱里被残害了生命。

彩霞本是个天真伶俐的女孩子，可是，当她刚能做事的时候，正逢上灾荒，家里因为交不起租子还不起债，李家圩地主硬逼着要彩霞去给李家当丫头抵租子。

进了李家，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煎熬。身上的每个地方，差不多都落上地主的竹条、皮鞭、烟钎、巴掌的印痕。夏天，少奶奶乘凉，她在旁边打扇子、捶腿；寒冬，少奶奶在床上睡觉，她得坐在踏板上守候。一次，少奶奶在吸大烟，彩霞蹲在地上睡着了，夜宵送迟了一步，惹怒了少奶奶，整整将她吊打了一夜。

可怜弱小的彩霞，怎能受得住这样的摧残，因此得病，几天不吃不喝。狠心肠的少奶奶竟丧尽天良地指使狗腿子奸污了她。

彩霞痛苦难忍，饮恨自杀了。

在李家圩，死一个佣人，就跟死一条狗一样。当家的三胡子李梦庚冷酷地说：“别说死一个，就是死十个，也动不了李家一根毫毛！”他吩咐家奴把彩霞的尸体，从狗洞里拖出去，埋在那荒山野岭里。

在李家圩，像彩霞这样的命运又何止一个啊！地主家小姐赌输了钱，还昧着良心，说是丫头们偷去的。于是，丫头们遭了殃。翠翠、春桃，因此被罚跪在钱板子上（古时放银元用的有楞的木器）和碎瓦片上。膝盖上红肿、流血，血水浸透了衣裳。满身尽是伤痕。

三胡子带着女儿炸汤圆子吃，丫头元芳送糖稍慢了点，三胡子便狠毒地上去抓起元芳的头发，他的女儿把元芳的右手按到油锅里炸。

农民尸骨累累，地主荒淫享乐

李家圩外方圆百里，人们在饥饿、逃荒、死亡……，而圩内的寄生虫们，却拿着人们的血汗，任意挥霍，过着极其荒淫无耻的生活。

李家圩的财主们，想让自己的子子孙孙坐享清福，于是强迫几千欠租欠债的佃户给他们修建了两座像宫殿一样的圩子。从动工到建成，整整花了十年时间。每一锹土，每一块石头，都浸透劳动者的泪水。人们悲愤地说：“围沟里流的不是

水，是我們的血啊！”“墊在牆下的是窮人的尸骨啊！”就在修筑这座封建堡垒的十年間，有多少妻子失去了丈夫，有多少母亲失去了儿女？她們哭干眼泪寻夫寻子，可是亲骨肉在哪里？！西山下的土坑，已經被尸体填平了。

再看看在死者的白骨上建造的这座“天堂”是什么样子：

外形，像一座严森森、阴沉沉的城堡，圩里砖瓦结构的房子达七百多間。有堂楼、客厅、書房、柜房、臥房、綉房，还設有碉堡、倉庫、酒坊、刑室、花园，并专门盖有戏台和戏楼，供少爷、小姐們休闲娱乐。屋檐下，砖雕木刻，描龙画凤，富丽堂皇。在后花园，还按照外国的建筑形式建造一座洋房。年逾花甲的老人这样形容李家圩：“李家圩是阳間的金鑾殿，又是阴間的閻王殿。”

历史上传說过商紂王这个无道昏君，在宮殿設有肉林酒池，三胡子李梦庚何尝不能与之相比？单单腌制的腊鴨，就挂滿了几个天井院；酒坊的大小酒坛，整整摆滿了三間房屋。他的大女儿出嫁，派了十多个采办，先后到上海等地去采購，抬送嫁妆的人，排有三里路长。当地群众估算了一下，这些嫁妆可以折合粮食四千担，足够八百个农民吃上一年。四胡子李松泉死了，千家万户拍手称快，而李家圩却隆重祭奠。四胡子在棺材里，头枕元宝，脚垫元宝，手拿元宝，嘴含宝珠，把剝夺来的金銀，同死尸一起埋葬。

穷苦农民只有斗争才有出路

統治階級压迫、剝削得越残酷，就越加激起人民的觉悟，

紛紛起來進行鬥爭。早在一九三一年，李家圩一帶農民在黨的領導下，揭竿而起，抗租減息，用土炮轟擊李家圩。雖然當時農民的革命暫時被反動勢力鎮壓下去了，却喚起更多人的覺醒，革命的怒火，仍在地下燃燒。

一九四七年，黨領導小部分游擊隊在李家圩一帶活動。反動地主們，對人民迫害就更加殘酷。有一次，一連抓去了幾十人，兩間刑房蹲得滿滿的。他們都被說成是“不安分守己，想反李家圩”，誰也沒躲掉地主的毒手。廣大農民日日夜夜盼望着紅軍回來，摧毀李家圩這座封建堡壘。

這一天終於到來了。就在一九四七年，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受苦受難的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掌握了槍杆子、印把子，對階級敵人實行了專政。李煥球帶領土匪武裝同我們頑抗，被當場擊斃。三胡子李夢庚逃到了南京，搖身一變，開起火柴廠來了。可是，法網難逃，終於被我們抓拿歸案，處決了。廣大人民的血海深仇，得到了伸雪。

解放後，李家圩一帶人民成了土地的主人，開始了新的生活。在黨的領導下，沿着共同富裕的道路，從互助組、合作社，最後辦起了人民公社。隨着一年一年的豐收，人們生活越過越甜。在幸福的日子裡，人們並沒有把苦難的過去遺忘，老一輩們經常提醒自己的後代：“翻身別忘本，走路莫回頭。”讓他們永遠記住李家圩的血海深仇！

管班插圖

白骨建造的“天堂”

——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调查记

李 累 之 光

这是个调查材料。老一辈的四川人还记得：四川各派军阀争防区，打仗火；活活打了二十多年。他们明筹军饷，暗饱私囊。

一个军阀得势，连他的叔侄兄弟、亲戚朋友也跟着飞黄腾达，黑霸一方。真所谓一人得道，鸡犬飞升。军阀中的大邑系，系里的刘文彩，就是一例。刘文彩在大邑县安仁镇有庄园一座，现在是“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我们记叙的，便是这座庄园的材料。

我们来到大邑安仁镇。出场半里路，就到了“地主庄园陈列馆”。绕着庄园转了一圈，足足花去两个小时。庄园四周，全是两丈多高的风火砖墙，仅东北两方，就有七座高耸的黑门。

地主庄园的大门，刘文彩称为“龙门”。门扁上刻有“受福宜年”四个金字。侧翼两壁钉有四个拴马的大铁环；两壁上下均有枪眼。庄门是坐南朝北，但进得庄来，大厅却是坐西朝东



了。看来很不习惯，好像庄门在跟大厅赌气，故意把头扭在一边。

天井里，摆着两个六角形的红沙雅石花瓶。花瓶高有五尺，两人不能合围。一个花瓶刻着文武戏文，人馬栩栩如生；另一个花瓶刻着山水楼台，玲珑剔透。提起这两座花瓶，还有一段颇不寻常的来历：

远在一九二七年四川军阀混战时期，目不识丁的刘文彩靠着族中军阀的势力，由取押收租、烧房卖酒的地主兼商人一跃而为“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就职叙府（今宜宾县）。接着又从“总办”升到“叙南清乡司令”，人称“双枪王爷”。原来，刘文彩有步枪还有烟枪。他凭着这两支枪勾结官僚，迫害人民，置

产业，买田地，修庄园，做生意，生活穷奢极侈。直到一九三三年，他的靠山被别的军阀打败，自己在叙府站不住脚，才缩回老家安仁。

刘文彩离开叙府时，将榨取群众的油水，利用子弹箱装满银元。大箱两千元，中箱一千元，小箱五百元，满载二十五只大船，浩浩荡荡，经乐山、新津，武装押运回家。连两个劳动人民创造的雅石花瓶，也被船载人抬，从路隔七百多里的叙府，搬了回来。

天井左厢是账房，天井右厢是客厅。此间有八丈宽，六丈深，右边是西式客厅，左边是中式客厅。中式客厅内摆设着一套紫檀木镶大理石的桌椅。我们并坐一椅，尚不擦肩。这种家具，我们曾在北京故宫与颐和园内见过，但是，比之皇家桌椅，它还多了一件东西：紫檀木上嵌了五彩缤纷的鱼骨，鱼骨尽雕成飞禽走兽、奇花异草。客厅是这样，那么，进了中门，直入刘文彩一家人住的几重天井，那些正房、后房、厢房里的摆设，大家也就可以想象了。我们见到刘文彩用的一床珍珠罗纹帐，重不过四两，收拢来可以一手握住。

这一大片房子，全被一层围房包住。这层围房过去是奶妈、丫头、大娘、绣花女工的宿舍，也是做灶房、泡咸菜、放年货、堆香蜡的地方；现在是陈列刘文彩罪行的展览室。走进这层围房，时而左，时而右，曲里拐弯，莫辨东西南北；围房路径，都是高墙夹巷，看来走到死路，至尽头又有拱门。幸好我们是紧跟着陈列馆的同志，没有困在“八阵图”中，万一离开，那就很难说了。

足足花了五个小时，我們才算看完整个地主庄园的一个角落。为探底里，我們便住在庄园。半夜醒来，听见园内水声潺潺，檐廊崩裂作响，好不奇怪。

第二天，我們仗恃胆大，謝却給我們引路的同志，便独闖庄园了。我們从靠近賬房的园門穿出，朝着和大厅相反的方向走去，走完一道夹墙深巷，便看見两边排列着数不清的仓房，好像一个中等乡場。經過折壁拐角，到了刘文彩的雇工院，黑压压一大片房間，橫七豎八，又密又挤，屋檐低垂，泥壁斑駁。我們鑽了半天，才走出雇工院。东倒拐，西轉弯，几十步一座高墙，几十步一道黑門，层层墙，重重門，分不清来門去路。我們不願久留，但已經不知哪里而来，从何而去了。

正在寻思，突然听见流水声音。找了半天，才发现一間阴暗寬敞的屋子里，有一条三尺多寬的水沟。屋子里怎么会开水沟呢？真是阴阳怪气。我們順着水沟盘来繞去，穿过一座小院，推开一扇沉重的黑漆小門，水沟却又变成小溪，順楼台亭閣流去，把我們引进一座花园。凭着陈列館的解說牌，才知道这儿有“小姐樓”，也有刘文彩的“欢喜亭”，亭頂还有他乘凉观景的阳台。后来，館內的同志告訴我們，这是最小的一个花园，庄园內还有两个大花园，里头修得有刘文彩的“夏季吸烟室”和“逍遙宮”。

連我們也不知道，怎样走进了他的“佛堂”。再左鑽右轉，穿竹林，过坟塋，竟来到一条十分辟靜而潮湿的窄巷，走攏巷底深处，有一沉重黑門，門上鉄环粗重，挂着巴掌大一把銅鎖。进了黑門，又是一条更窄更黑的夹巷，两边砖墙长滿青苔，还

在浸水，我們感到发冷。往左弯，又是一重黑門，又吊着一把火鎖。进了二重門，有七級石梯，沿牆是个石坎。我們下了石梯，仰望石坎，竟有两人多高，砖牆高不見頂。坡底有水，深过脚背，真是又冷又黑。細看四壁，百物不生，連蛛网也沒有一个，頓觉毛骨悚然。我們手拉着手，又往左弯，見石壁，有第三重門。这重門，有五寸厚。我們用力推开，室內轟的一声，水往外涌……。

原来这里是地主庄园的水牢。

我們看到了水牢里有一架鉄籠。

我們还看到鉄籠里面釘滿了尖刀和鉄刺。

这样的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王法”和刑具，还是我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从水牢里，我們能够看清这个軍閥、官僚、袍哥、恶霸地主四合一的刘文彩的嘴臉，也不能不想起过去受难的階級弟兄姊妹。

二

我們还没有看完这座地主庄园，就已深深感到它是一部地主階級迫害劳动人民的历史。攔在心上沒有解决的問題，迫使我們要作仔細的調查。我們走出庄外，串連貧农，找到了快滿八十岁的刘大娘，她含泪告訴我們庄园的来龙去脉。

原来，在早这是一个百多戶的大村庄。刘文彩在叙府拨回銀子，只修了一栋三合头的房子。他在叙府丢了“叙南清乡司令”这頂紗帽，回到老家，就存心当“土皇帝”。头一着棋，便是扩建庄园。刘大娘說，現在的大門、厅房的屋基，原是刘义

和、刘老么、长生娃的；雇工院是刘吉盛、刘大姐几户人的；小姐楼是补锅匠的；麻雀楼是刘益山的；另外还有万木匠、万二师、麻么嫂、黄么姑他们几十户的房子。就刘大娘一个人，便点着指头给我们数了三十一户。刘文彩霸占一户，修一层墙，开一道门；整掉两户，又修一层墙，又开一重门。我们这才恍然大悟，难怪这座庄园修得稀奇古怪，七弯八拐。这三十一户人家，有的家破人亡，有的流落外乡，有的音信杳无，每一家都有辛酸的经历，每一道墙都记载着劳动人民的血海深仇。

向刘大娘告别时，她说：“你们回庄园看嘛，玻璃柜里头有三件血衣，那是彩老五霸占刘益山的房子欠的命债。”

我们看见三件血衣时，刘益山在一旁沉默不语，光用拐棍狠狠地戳着地板。刚才我们听他讲述了经过始末，很了解他此刻愤懑的心情。事情是这样的：

刘文彩在修“逍遥宫”那座花园时，就贪图刘益山的房子和六亩水田。真所谓“三月间的菜苔——早起了心”。他喊狗腿子刘绍武去说话，刘益山横顺不答应。身兼乡长和袍哥大爷的刘绍武，没有想到自己会碰壁，刘文彩更没有料到刘益山胆敢打狗伤主。修好庄园，院墙筑到刘益山的房子背后了，刘文彩愈发眼红，他叫刘绍武放话，栽诬刘益山通匪，要打死他。刘益山晓得鸡蛋碰不过石头，只好丢下老母妻儿，流落外乡。

刘文彩一计未了，二计又生，命人开一条大水沟，直通向刘益山正屋，白天黑夜冲刷土墙，逼他老母搬家。老母亲吞不下这口恶气，病倒在床。日子稍长，这股毒水冲破土墙，淌进屋里，淹到床脚。老母亲躺在床上，昼夜啼哭，半夜醒来，喊着

刘益山的小名，边哭边问：“你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哪里去了哟？”等他得信赶回家里，母亲已经死去。

坟土未干，刘文彩张嘴又要房子。刘益山向他説：“大树底下好遮蔭，留我沾你老輩子的富貴气。”話再婉轉，也打不动刘文彩的黑心，反而給他用下一場禍事。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刘益山請了姑媽的孙儿楊健民和两个朋友帮忙栽秧，他吩咐女人推豆花，自己使上街买滷水。

突然晴天霹靂，刘紹武指揮一伙乡丁、袍哥跑来，从袖筒里拉出短枪，把楊健民打死在田里，两个朋友惊惶乱跑，一个被追至坟坝打死，一个死在沟边。死去的三个农民弟兄，手中都紧握着被鮮血染紅了的秧苗。

另一股人馬，追到安仁鎮上，抓住刘益山，繩捆索綁，丢进乡公所。刘益山的老婆四处托人，說尽好話，分文未得，只好在卖地文約上盖了手印，才从死路上撿回刘益山的性命。刘益山心想，上成都，刻木板，印劝世文，告他的阳状；奈何刘文彩一个巴掌遮了半边天，受苦人寸步难行。一家人就这样被撵出来，搬进下雨天戴起帽子煮飯的破屋。

于是，刘文彩笑嘻嘻地看着“逍遙宮”那座花园的院墙，开了一重門。刘益山和我們走出陈列血衣的展覽室，正好走出这重門。出門一看：他的老房子早就沒有了，刘文彩新修了一幢楼房；他的六亩水田也沒有了，和另外十几亩田一起，修了两座大庄院。庄院的門匾，却是“祥呈五福”“紫气东来”八个大字。

就在楼房面前，刘益山激动地説：“請看，这是我老屋基当

門的柑子樹，這是我的青杠樹，跟我一起長大的青杠樹！”他邊說邊摸，將近二十年的往事，一齊湧向心頭，禁不住老淚縱橫，禁不住又把拐棍狠狠地戳着泥土，一戳一個深印。

劉益山還是劉文彩的隔房侄兒，都受到這樣的血腥迫害，那些外姓貧農的遭遇，就更加悲慘了。提起家無男丁的劉大姐母女，被劉文彩拆掉房子，攆出安仁，遠逃蘇場，孤女寡母傾家逃命的事情，人人傷心，個個落淚。我們每次走到雇工院，就要想起劉大姐，我們每次路過蘇場，就要想起這一對孤女寡母，正如我們不會忘記那泥土上的一個個深印，那是階級仇恨的烙印呵！

請問：劉文彩霸田占屋，害得農民家破人亡，修下這麼一座可容幾千兵馬的大莊園，他一家住在這兒的究竟有多少人呢？

六個！

確實是六個！又是一個叫人難以相信的材料。

據我們調查，經常住在莊園的有劉文彩和他的五姨太，他的大兒子劉元龍和媳婦，他的三兒劉元富，他的么女劉元俊。仅此而已。但是，僅僅在這個莊園內，他的總管家、管事、烟槍手、保鏢、兵丁和服侍他的奶媽、丫頭、大娘、廚工、裁縫、綉花工、雇工以及專門泡咸菜的，就有一百多人。除此以外，還有保衛他的一支手槍連隊伍。

莊園內的灶房，是一長排。伙食分了四等：劉文彩和五姨太吃“御灶”。單說他兩人吃鴨子，一頓就要三十幾只，原來他倆只吃鴨足板上的踐。他的兒女、媳婦、總管家吃“總其成”

灶，管事、狗腿子吃“上灶”，雇工、杂役只能吃“下灶”。灶房前面的天井里有两个水井，刘文彩一家人用小水井，雇工杂役用大水井，连吃水也由他分了阶级等级！不仅如此，刘文彩还叫人在灶房中间、天井中间砌了一堵高墙，将灶房和水井各分做两个天地。这真是强盗怕影子，刘文彩害怕雇工毒杀他的狗命。

刘文彩自称“龙门”，当“土皇帝”，要“受福宜年”，他的权势、爪牙、财产、田地，自然要超出这个庄园，他迫害和剥削农民的事件，何止霸占这个庄园的百多户人家。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庄园走出去看看吧。

三

暂不走远。出庄园，走半里路，就到了安仁镇。安仁镇赛得过一些较小的县城。镇上有七条街，除一条老街以外，全部房子都姓刘。而刘文彩一人就占了四条街房，另外两条街房，他还有一半。据调查，一间街房，他每年收三石米房租；逢场赶集，摆地摊的还要交孝敬钱。

刘文彩在镇上修了一个戏院，用他的号名，叫“星廷戏院”。跑到他的码头来演戏的艺人，无不受他的侮辱和蹂躏。有一回，刘文彩和他的三儿子抢着玩弄一个坤角，争风吃醋，父子俩在庄园里演了一出大打出手的“武戏”。正如戏院大门两边的横匾所写，这些“世界奇观”，不过是地主阶级的“人情现象”。

在两条大街中间，刘文彩又修了一座乡场上罕见的三层

洋楼。楼房骑在街心，人从下面经过，活像一个袍哥横叉两腿在街上占吃霸踹的样子。这正是刘文彩的袍哥机关——“公益协进社”。它下属的分社、支分社、支社，遍及大邑、邛崃、崇庆、新津、蒲江、眉山、彭山、丹棱、洪雅……以及原西康省的雅安、天全、宝兴、蘆山等几十个县，各地的土豪、劣绅、伪乡长担任了各道码头的“大爷”“拜兄”，统辖了十万以上的“兄弟伙”。刘文彩就是这十万“兄弟伙”的“总舵把子”。总社设在洋楼里，楼下茶馆是办公室，处理来往“公事”就在茶桌上。

我们看到这个袍哥组织的“信条戒条”，这是刘文彩示意拟就的。开宗明义第一章上写着：“……共党纷扰，国基未固，凡我同人应本初志，在三民主义领导之下，努力奠定国基。”戒条中的“严禁参灶”（奸淫自家妇女）等等律条，“兄弟伙”都在刘文彩的率领下，争相开“戒”破“禁”。

和洋楼相呼应的，是刘文彩在街上修的花园，这是他的政权机关。刘文彩在这里，用“总办”“司令”的身分，接受四方区长、联保主任的参拜，也委任大小官员。枪杀杨健民三人的安仁乡乡长刘绍武，不过是守在庄园门口的看家狗而已。袍哥和政客都被刘文彩作了安顿，还没有栖身窝子的土匪，刘文彩就命他们夹杂在花园与洋楼之中，随意逍遥抖摆。过去大邑一带的土匪头目郭保之，群众都晓得是刘文彩的亲信。间或被传到庭园内的“夏季吸烟室”，同耍虾须枪，大谈鸦片生意。

刘文彩在庄园呆闷了，就要到洋楼与花园。他一上街，场都要散一半。姑娘们一听到吆喝，赶紧躲到床背后，老太婆关

了大門，還要加根抵門杠。刘文彩走在街上，背枪的立正，长袍馬褂的打躬作揖，那些身穿短褂、头扎馬耳結、脚登絲耳草鞋、屁股上用着枪把上拴的紅綢綠總的就“丢拐子”（袍哥行礼的行話）。一进洋楼，袍哥大爷起位，老么递烟捧茶；日已偏西，大家还异口同声地說：“总办早。”

刘文彩掌着刀把子，势力遍及軍、政、袍哥、土匪各界，还不甘心。他打算收一百个干儿子，豢养为貼心奴才。在洋楼上，有人向他耳边一吹：“总办公，講点时兴，学蔣总裁办軍官学校嘛。”他听了点头一笑，于是百亩良田和許多民房，变成了洋气十足的“文彩中学”。

在安仁鎮上，他修街房、戏院、洋楼、花园、文彩中学的地皮，无不是强买霸占来的。这些勾当，刘文彩只在幕后使法，亮手亮脚，他就用得着刚才我們所說的那一群家伙了。

下面，我們只記叙他千百件勾当中的一个材料。

四

一九四二年，刘文彩修中学，借用“公事”名义，分文不拔，大刮地皮。当时被撵走的农戶，成串成群。今天用石灰圈了地，明天还不动手拆房子的就倒霉。好多人都向我們說，当时能頂撞刘家的要算罗二娘，受害最深的也是罗二娘。我們在离場不远的的一个土坡上找到了她，她把我們引到家里，回叙了这一場經過。

罗二娘的丈夫叫罗吉安。他們有儿女，女儿嫁给一个从仁寿来安仁的理发工人，儿子罗学成也娶了媳妇，另外还有两



卷

个小娃。他们难度日月，但很和顺。一家人的遭遇，就发生在刘文彩叫人在他家屋基周围撒了石灰以后……。

撒了石灰，罗二娘没有拆房子。狗腿子来质问，她说：“刘家墩子风水好，出举人，为啥不修在墩子上？”罗二娘的话，传到刘文彩耳里，硬是把他气炸了。原来，刘文彩斗大的字不识两箩筐，靠哥哥兄弟得势，买了一个“举人”。罗二娘揭了他的底子，他更加怀恨在心。

刘绍武得了刘文彩的口示，先把罗吉安吊在乡公所，又喊潘德成派人去拆房子。罗二娘的娃娃还睡在床上，房顶上的瓦块嘩啦啦朝屋里垮。二娘照顾到房子，探望不到男人。她

托人带信給女儿,叫她回娘屋照看几天,自己便跑到乡公所打听男人的下落。二娘看見丈夫周身被打得像茄子一样,真是心疼。她拿定主意,救人要紧,便向刘紹武說:“东也是住家,西也能安床。我拆房子,我搬家。”刘紹武沒得話說,只好把罗吉安放了。

罗二娘找到两家人打伙,东借西凑,才在場口寻到一块坟地。一边搬家,一边搭人字棚棚,三个石头頂口鍋,总算解决了吃住。

事情过去几天了,刘文彩还把罗二娘的話記在心头,像刀子刻在石板上,洗不脫,抹不掉。她想看看罗二娘,看她生得多恶。有一天,他去花园,在街上碰見一个年輕女人搬桌子,正在歇气,見她生得俊俏,就死死盯着不放。刘紹武看出了他的心事,道出了她是罗二娘的女儿。刘文彩問:“哪个罗二娘?”刘紹武答道:“就是罗吉安屋头的。”事情凑在一起,刘文彩更不松手,高矮要罗二娘的女儿做丫头。

罗二娘在坟地还没有住热,潘德成就来买人。二娘說:“女都打发了,高攀不上。”刘紹武借口二娘的女婿沒有交清“总办”的房錢,就把他弄来关起。罗二娘和女儿把家私当尽卖絕,設法营救女婿。两娘母一想起人众皆知的綉花女工李二姐,被刘文彩强奸有孕、用葯毒死那桩事,就像猫抓心子,一身都紧了。罗吉安是个本分人,啥事都听二娘安排。二娘說:“拚着命不要,也得把人保住。”正是八月中秋,富豪人家在团圓,二娘却叫罗学成和媳妇趁着月亮大,送姐姐到亲戚家中去躲风。

刘紹武、潘德成沒有把人弄到手，气得刘文彩鬼火冒：“你們連一个老娘子都吓不下来，吃屎都該摻把沙。”吓得刘紹武一边点头，一边答应：“是，是，是。”还是刘文彩肚皮烂，接着出了个詭計：“她不交女，你就說国难当头，抓她儿当壮丁。”

送走了女儿，罗二娘才看見还没有来得及搬进棚棚的一张床，日晒雨淋，床脚都生了茵了。正在这时，刘紹武带起“兄弟伙”来抓壮丁，罗学成不在家，就逮走了罗二娘，把她和女婿关在一起。二娘看見女婿一身血，衣服打烂成巾巾，布都陷进肉皮，忍不住失声一哭：“儿呀，是我連累了你。”第二天，罗二娘設法交了冤枉房錢，刘紹武才喊她女婿滾出安仁鎮。女婿临走时，說：“娘，儿离安仁，死活不知。娘呀，不晓得我們做梦还能不能团圆……”二娘听了，哭得死去活来。

罗二娘哭干了眼泪，这以后，她拚着舍了老骨头敲鑼打鼓，啥也不怕。她告訴我們：“穷人的胆子是他們逼大的，班房底底我都摸穿了，还怕啥子挨打、上吊。”二娘只愁一件事，深怕罗学成回家被抓住。隔了几天，一个晚上，刘紹武来誑二娘，二娘也哄他：“我出去找儿找女。”刘紹武以为她撑不住了，就叫一个乡丁押着她回去。

这时，已經二更天了。乡丁押着一个女人，毫不在意。走到坟埧边，二娘假意說解溲，往草籠籠一鑽，赶紧順坡滾下，沿着漕沟，躬起身子边爬边跑，一口气跑到十里远的苏場。她看着門上紅灯，誤認是客店，就輕輕拍門。門开了，出来一个女人，把她讓进去。二娘悬心吊胆地訴說自己的苦情，不料那个女人一边听，一边哭不成声。摆起来，二娘才知道她就是被刘

文彩霸占房子，撵出安仁，逃到苏場的刘大姐。受苦人，心連心，刘大姐留下了罗二娘。

避了三天风声，一清早，刘大姐叫她女儿給罗吉安送口信。等到天黑，二娘的女儿、媳妇、儿子才逃到苏場。母子四人見面，担心外人发觉，哭都不敢哭一声。当天晚上，二娘下决心逃出刘家天下。临走时，刘大姐千叮嚀、万嘱咐，給了二娘五块钱，又叫女儿把他們送到河边。母子四人担心桥上有刘文彩的崗哨，只得蹠水过河。天又黑，河又寬，河水淹齐半身，他們一个牵一个，东偏西倒，摸了一大半夜，才爬上河坎。一路上，白天啃紅苕，晚上背庙子，四个人頂一床烂棉絮。拖了三天三夜，才走攏蒲江，逃进大山，找到了二娘的亲妹子。

她妹子，是佃戶，也是一天三頓把鍋儿吊起当鐘打的受苦人。二娘投奔来此，真是黃連加上黃梔子，苦上加苦。揭开鍋盖，只有一鍋野菜和清水。乍到山里，人生地冷，又无押佃銀子，租不到半分田土。一家人合計，只好掏出刘大姐給的五元钱，买一些谷草，二娘和女儿、媳妇打草鞋，再买点甘蔗、瓜子，喊罗学成跑溜溜場，做小买卖糊口。

一家人有上頓、无下頓，四个人啃一个鍋魁，又拖了两三个月。誰知道，偏东雨指着漏屋淋，几个草鞋本錢，又遭袍哥“棒客”搶光，罗学成只留住一条命和一条褲子，討口回家。一家人生活无着，偏偏女儿又在这年冬天生下一个娃娃。沒得办法，只有拴紧褲腰带，把几张嘴巴省下来的供女儿吃，就这样，女儿十天才吃三頓飯。女儿朝思夜想她男人的下落，憋了一場气，又見不到半顆油珠，哪能挤出一点奶水；只有四处討

点米湯，拖住娃娃的一口气。說来伤心，奶娃連哭叫一声的气力也沒有。

那年冬天，烂棉絮保住女儿和奶娃，罗二娘脫下一件衣服給女儿。二娘和儿子白天黑夜冷得像篩糠。挨邻側近的人看着可怜，才給了二娘两个麻布口袋。这两条麻布口袋，二娘一条，罗学成一条，白天披在身上当衣服，用谷草扎了又扎；晚上当鋪盖，两娘母周身縮做一团……。

一家人逃进山里，保住性命，日夜挂念着罗吉安的死活，女婿的下落。他們很想悄悄回到安仁探听，又怕从虎口逃出的性命再落到刘文彩手里。媳妇日思夜想，媽媽不能走，自己的男人和姐姐也不能下山，只有自己还可以回去摸个虛实。她向二娘說了三天三夜，二娘也不答应。罗二娘本想硬起心腸应允，又怕出事，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心里七上八下。媳妇无法，只好和罗学成商量妥定，哄住媽媽，偷偷跑回安仁。

話分两头。自从二娘他們走后，刘紹武日夜逼着罗吉安交人。罗吉安一身是病，带着的两个小娃，早拖得皮包骨头，比猴子还瘦。实在无路，只得把祖先留下的九分水田算作壮丁費交給刘文彩，才松活了几天。

罗吉安做梦也沒有想到媳妇跑回家来。两翁媳見面，哭声未絕，刘紹武便率領潘德成一伙人攆进草棚，用手枪抵住罗吉安的背心，把媳妇搶走了。

刘文彩看見二娘的媳妇，吐了吐口水，摆了摆脑壳，向刘紹武一挥手：“你們拿去用吧。”刘紹武沒有交到差，一肚子火便傾在二娘媳妇身上，取了一石米的身价，把二娘媳妇卖給了

手下的“兄弟”。

罗二娘在山里，沒見媳妇回来，牵腸挂肚睡不着。她丢心不下，好歹劝住了儿女，自己又摸回安仁鎮。那天黄昏，罗二娘还没走攏屋，又給刘文彩的狗腿潘德成看見，隔田坎就“乒”的一枪，人急生智，她反身朝嫂嫂家里跑去。二娘在嫂嫂家床脚底下躲了一夜，才知道媳妇的伤心事。

罗二娘告訴我們：“我护儿护女，一家人还是四分五散。刘文彩逼走我女婿，害得我女儿哭死哭活。媳妇回家，刘文彩又像餓老鷹一样把她叨走了。刘文彩一个人，拆散了我家两对青年夫妇，逼得我夫妻母子不团圆。他把我們赶进坟塋，偏偏又住在他狗腿子潘德成的脚边，我老汉出門上街，过他門前的一节节路，一年要交五升豆子。同志，解放軍为啥不早来十年呵。

“我回家見不到老伴，看着两个小娃，床脚躲一夜，又逃回山里。下山上山，只給儿女带来两眶眼泪。

“我們活出了头，一辈子不忘毛主席的恩。女婿和媳妇，从此沒有音信，叫我心都想穿。咬死刘文彩，也消不了我心头的仇恨……。”

二娘送我們走出大門，走过当年曾經收过她家五升豆子的小路，又回到了庄园。

我們从庄园南端第六道大門进去。里面是两个并排的大天井，天井四周全是寬敞的房廊，这是刘文彩收租瞭谷的地方，也是他的“鉄板租”逼死人命的关口。过去，每逢秋收时节，刘文彩坐在“欢喜亭”的阳台上，看着他的狗腿押着佃戶，

从四面八方牵成綫綫担来租谷。佃戶們用血汗泡大的谷子，倒进他特制的滚珠风谷机，倒进“星廷监制”的黑漆大斗，經過他专门訓練的“斗把手”一撮一刮，一石变八斗，八斗变六斗，真是梳子梳，篦子篦，刀子又剃，榨取了多少人的血汗。

我們很想了解刘文彩的地租剝削的真实情况。听说，省人民代表、唐安公社党委副書記冷月英同志曾遭受刘文彩更为恶毒的折磨。我們拜訪了她。下面記叙冷月英同志的材料，以刘文彩对她的迫害为主，也談及其他地主的罪恶，大鬼小鬼，总是地主阶级，所以一并记录下来。

五

庄园到唐場七里。我們到了唐場，就打听冷月英同志，每逢我們問到的老人或孩子，沒有人叫她的名字，也沒有人喊她冷書記，他們都說：“你們找冷媽媽呀！她在家。”我們最初听到人們叫她冷媽媽，還不在意，以为这是小姑娘对她的敬爱。問的多了，說的也多了，我們才了解到冷媽媽这个称呼里，蘊藏了許多含意深长的内容和亲切的感情，它多么准确地表达了冷月英同志和群众的关系。

見到冷月英同志，她已經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冷月英同志赶上前来，抓住我們的双手，又亲昵地拍打我們的手臂，一股热情的心意流到我們的心胸。她拉着我們上了台阶，拉着我們进了办公室，爽直地問这問那，安頓我們在她的身边坐下。我們說明了来意，她沉默了，低下头好一陣才抬起头来，眼睛死死地盯住牆壁。在长久的沉默中，我們誰也沒有插一

句話，她右手撫搓着胸口，嘆了一口長氣，才緩緩地向我們敘述。而我們，隨着她的敘述，經歷着她悲慘的道路，她把我們從陽光的世界，帶到了人間的地獄。

“我懂事那陣很小，不曉得爸爸在哪裏。媽媽一雙手，按不住兄弟姐妹五張嘴，天天愁飯吃。挨不過餓日子，我才上八歲，二十塊錢便賣給了一家姓徐的地主。我在屋頭沒得吃的，人不肯長，丁丁矮，偏偏地主家的門坎又有兩尺多高。翻門坎還要雙手撐着才過得去，叫我提水搬東西硬作難，不是潑濕了地就是碰翻了桶，他們罵我，揪我，掐我，還用雞毛帚子揮我——現刻我在街上，看到做雞毛帚子的、賣雞毛帚子的，還渾身發冷。

“苦了兩年半，我在徐家沒有睡過床。地是鋪，被是草，一間大房子裝着我，比睡在棺材頭還冷。骨頭熬不過十冬臘月，有一回我溜到灶房睡在板凳上，半夜三更，他們把我從板凳上推下來，賞了兩腳尖，抬走了板凳……。

“一天兩碗飯，比在家里喝冷水灌肚腸更難過。人是一條命，這里活不出去，我只有跑呵！從彭山跑到新津，一路討飯吃，那陣子，男人剪辮子才七八年，我一個女娃娃怎好四處要飯。自己褻了心，撿瓦塊，找鐵片，躲在地里連扯帶抓的割頭髮，長一節、短一節的扯下來，抓下來，割下來，痛得我睡不着，還整不干淨。隨後，苦苦哀求人家，借了一把剪刀，坐在別人階沿上，好歹剪成了一個和尚頭。在外討飯，足足有半年多光景。才上十一歲的娃娃怎么不想媽，吃了一頓飽飯我想她，喝口井水我想她，夜晚天當鋪蓋我想她。睜起眼睛看天，眼淚

比挖断田坎敞起流的水还多呵。

“悄悄跑回屋，看见妈的样子，我脚都挪不动一步，妈看见我，马上吓得昏死过去。好半天她才醒转来，哭着向我说：‘娃娃，你为啥要回来呵？妈不看见你倒还忘了，看你这一眼呀……你哥哥……’等到天黑，妈才原原本本告诉我这半年多出的事情。

“我从徐家跑出去了，他们向我妈要人，把她的颈子都打偏了。妈交不出人，他们就把我哥哥绑到河边，又把妈妈生拉活扯地拖去。徐家地主向我妈说：‘二十块钱买的人，交不出来就抵命。’话未住口，他就叫人用刀划去我哥哥的右膀。妈给我说：‘杀你哥哥，他们还喊我睁起眼睛看到。’接着，又划去左膀，才把我哥哥丢到河里。我抱住妈哭，妈还劝我：‘你还是走呵，在家里只有死路一条。’两娘母一夜没有睡，没等天亮，妈就催我快跑。临走时，她才在我耳边说，爹在新津帮人。

“我又从彭山到新津，一路讨饭，一路打听，一年多才找到爸爸。他在人众面前不敢认我。那天半夜三更，爸爸在大路边上黄桷树的洞洞里寻到我，他给我说：‘娃娃，你胆子真大，这家地主跟那家地主是通气的呵。我当着人众认你，传出风声，你这条小命还保得住？娃娃，你还嫌爹丢了你哥哥不够心疼么！’我这才知道，不是爸爸心狠，只怪我丁丁小不懂事。爸爸牵我到庄门外的碾场里，从草堆里取出几斤米来，喊我投奔他的朋友——大邑县上安乡冷家。”

冷妈妈谈到这里停住了。

她当时是个不满十三岁的小姑娘，虽然还不知道以后的

日子将被怎样安排，但是究竟终止了两年多的乞讨生活，有了安身落脚的地方。我们正在思索，冷妈妈望着我们又接着说了下去：“我生长在大邑，我不是大邑人，我跟着丈夫姓冷，我本来不姓冷。”冷月英同志到了冷家，和丈夫、公公三口人相依为命。冷妈妈告诉我们，冷家只有五厘地，仅够搭两间茅草棚棚，竖一个笆笆门，这便是指靠生活的全部财产。

他们在折磨人的生活中，又过了许多年。从她的语气和眼神中，听得出来也看得出来，冷酷的生活把她锻炼得更倔强了。当她再叙述自己身世的时候，她没有凄凉的语调，尽管她说的都是血泪斑斑的事情。

“丈夫替人吆鸭子，我跟老人佃田做庄稼。年年交租子，我年年都要挨一回捆绑吊打。挨打挨吊抵不了租子，每一次都是洗清家当凑足租谷才能了事。那年头不止我家遭罪，个个泥脚杆都逃不脱地主的祸害，甚至事外人也免不了牵连。

“有一回，我在唐场场口，看到刘家的狗腿子晏子辉骑在马上，马屁股后头拖了一个老头子。籬篋绳子把老头捆得帮紧，拴在马鞍后头。马走得慢，人还跟得上；一进场口，晏子辉抽了几马鞭，就把老头子拖起走了。大家实在看不过去，悄悄咬耳朵。我忍不住，冲口说了句：‘交不起租子，人就不是人吗？’话递进了晏子辉的耳朵，他煞住马，从袖筒里抽出一节东西，刷的一声，变成了两尺长的钢丝鞭子，使尽他抽足鸦片烟的气力，抽了我一顿。不怕他凶，我抹了抹血，抵住他吵。街上的人围多了，他下不了台，就把我扎个五花大绑，和老头子一起拖进关帝庙他们的乡公所。

“到了关帝庙，把我吊起。他的烟瘾过足了，把我放下来问一阵；问累了，又吊起来打。他一連整了我两天两夜，我也沒有軟嘴。晏子輝在場上作的恶，惊动了街坊邻里；他沒有办法，才叫伪保长范荣斋出面轉弯。晏子輝放我的时候，憋不住心头那股杀气，他抓了一匹火砖砍在我手臂上——冷媽媽挽起左手的袖子，我們看見她的手拐上有一块两寸多宽的伤疤——这算不了什么，我在上安、唐場一带做了二十年的庄稼，岂止这一桩事么？只有这一块印記叫我忘不了他們么？二十年，我們年年租田，年年退佃，这里起坎，那里上門，哪一块不是刘家的田呢！刘文彩的，刘元璜的，刘脚牛的，刘瘋子的……刘家几爷子黑霸一方，硬是整得草都不长一根。

“提起我种刘文彩的田，話就长了。

“一九三七年天干，白穗多得很。挨边撻谷交租，我丈夫和老人在外头吆鴨子还没回来，我有个八岁大的姑娘，什么事也帮湊不上，自己又是怀身大肚的人了。穷人指靠穷人，多亏周围团轉的朋友来帮我收庄稼。我在灶房給大家烧茶，撻谷子的倒給我发起愁来了。一块二亩二分的田，还收不足一石，这一亩要交八斗租，怎么开交呢？我把茶送到田坎上，大家給我出主意，叫我留下几分田摆起，請老板看了好讓点租子。那陣我都是尝够了酸甜苦辣快攏三十岁的人了，滿不在意地向大家說：‘怕啥子，橫順每年撻谷交租，我都要到刘家耍一轉。’这句话倒把大家逗笑了。

“刘文彩派人来收租，坛坛罐罐倒干淨了，还差五斗二升租谷。狗腿們拍桌子，摔板凳，雷天风火，鬧得几里路外的人

家都晓得。随便我怎样说，硬是雷打不脱的‘铁板租’，半升一碗都不让。他们不管我怀孕大肚，硬要拉我去见刘文彩。后来我答应想办法，他们才说明天来算账，一路人马来拍拍屁股就走了。

“穷人事多路窄。当天晚上，我肚子就发作了。鸡还没有叫，又生下一张嘴来。别人吃早饭了，大女跑来守在我床边哭，问我拿啥子东西下锅。我想硬撑起身子下床，奈何昨天挨了顿毒打，又刚刚生下娃娃，简直不能动一下。实在无法，我才叫大女到别人家去借五合半升。大女出去还没有回来，刘文彩又派人来了。他们进屋不走门，是打烂我的壁头拱进来的。我要他们宽限几天，等我男人回来设法交齐五斗二升租子。他们不听半句，抓的抓头发，拉的拉手臂，硬把我从床上扯下来捆起，枪托子在我背上打，奶娃子在床上炸啦啦地哭，大女回来就挨一巴掌，拨撒了半碗米，连扑带爬的抢糞来，抱住我的脚杆：‘妈呀，不要走呀！妈呀，不要走呀！’

“妈走不走由不得自己呵！”

“我被绑走多远，还听到两个娃娃的哭声。架走我以后，奶娃就活生生的……饿……饿死了。谁晓得我那丁丁小的大女，比妈讨口那年，还小两岁，才八岁呵，又朝着妈走过的路，去挨门挨户讨饭……”

冷妈妈再也说不下去了。

我们从她黝黑的双手和灰白的头发，可以想到当年的情景。但是，我们还没有想到，这个在熬煎中站立起来的倔强的女人，这个曾经说过“每年都要到刘家耍一耍”的硬骨头的女

人，在一九三七年时，她遭到刘文彩更加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经济剝削。

室外的阳光已射进窗来。冷媽媽繼續向我們叙述地主阶级残酷迫害她的生活，虽然她滿眶眼泪，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們从她充滿阶级仇恨的叙述中，了解到冷媽媽是一个坚强的不怕鬼的女人。

“他們把我綁出唐場，过了斜河，朝安仁方向带去。还没有走完河滩，有人就解下一条很长的腰带，把我的眼睛蒙住。好像又走了五六里路，就东上阶沿，西跨門坎，繞了許多弯子。那陣是三伏天气，滿身衣裳早給汗水泡湿了；我本是昏迷不知人事的人了，陡然觉得寒气逼人，从阴冷中清醒轉来。

“松了綁，放开了我的眼睛，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停一陣，才晓得我是站在又黑又窄的巷子里头。他們开了几次鎖，把我推过几重門，越走越黑，越走越冷，冷得我骨头发抖，心子紧成一团。天啦，我不知道他們要把我帶到一个什么地方。有个家伙，使劲把我掀下一个陡坡，摔倒在水沟里。

“这是什么水呵，冰得浸骨头，臭得人恶心。刚生了孩子，血水还順着腿上流，遭冷水一吸，痛得我肚子像刀絞。他們把我朝里头一推，用木棒把我戳进一个鉄籠子。跟着，我就在迷迷胡胡听到的鉄柵声、关門声、上鎖声中昏死过去了。

“什么时候醒来，我不知道。我只晓得自己是痛醒的，痛的像有人剪我的腸子，絞我的肚子。醒轉来，什么也看不见，只摸到一根一根的鉄柱；我双手拉着鉄柱站起来，才觉得水淹过膝头。崩断我的腸子，我咬紧牙齿熬得过去；这里头的臭

气，硬把我熏死了
几次。

“熏死过去，痛醒转来。有一回，我硬睁开眼睛，从一道巴掌大的铁窗射进来的一股绿光，才恍恍惚惚看清楚这个水牢世界。我是被关在水牢的铁笼里，铁笼外边还有三个男人，东倒西歪地靠着石壁坐着，泡在水中。我们几个，在装着好多穷兄弟的骨头和血水的水牢里，没有哭，没有喊叫。隔了两天，死去一个兄弟，我们的血泪只有朝肚里吞……”



“一共提审了我三回。每次提我，都是用铁钩把我从水牢里抓出去的。三言两语过了堂，又把我推进水牢。第二回下

牢，我站不住，坐不穩，這邊是死人，那邊也是死人，一脚踩到腦壳，二腳踩到身子，每腳都踩到我的叔伯兄弟，真叫我痛心。

“最后一回审我，是刘文彩。狗腿子罵我前次在关帝廟鬧动了唐場，才有刘文彩問我的緣分。等了半天，不見动静。刘文彩賣什么膏藥，我不曉得。后来，我聽見狗腿子都在打听，有人說他正在啥子‘逍遙宮’……。”

沒等冷媽媽說完，我們已經無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在同一个庄园內，刘文彩有吃人的水牢，也有荒淫无耻的場所。我們從他的貼心狗腿陳吉輝的口中，知道了刘文彩的腐朽生活。他一邊在水牢里殺害我們的階級兄弟，一邊又在“逍遙宮”和“歡喜亭”里，聚集姨太太和偽鄉長的女人，幾乎一絲不挂的“逍遙”和“歡喜”；刘文彩高興時，抹下金簪子丟在地上，逗引女人們狂搶作樂，或許是和這些婆娘一起逮貓作戲。他玩得精疲力竭，便喝人奶。他專門養了六個奶媽，逼她們丟下嬰兒，擠干奶水來滋養他這個五、六十歲的淫棍。在這個庄园內有秘密的水牢，在他的另一個庄园內有隱藏的金庫；水牢的前面是他的佛堂，通向水牢的庄园的後門，門匾上還刻着什麼“德門仁里”。儘管這些都是昨天的歷史，難道我們能夠忘却么？

冷媽媽的遭遇並沒有結束。

“刘文彩來了。他問我願死願活，我說死活都不論。就問了這麼一句話，又把我掀進水牢了。以後的事情，我自己完全不知道，是丈夫告訴我的。他說，用了二十塊銀元，說了許多人情，刘文彩才答應放我出來的。我在水牢里整整有七天。

丈夫接我的时候，我簡直像个死人了，留有一口气，人事不省。他把我背出了刘文彩庄园的后門，把我捆在椅子上抬回家里。

“我滿身血水，双足粘了死人肉，他給我抹，他給我洗。他說我脚上、腿上的血水都結成了痂块，死人肉耙着活人肉；足足有十几天，人不知道飽餓，只能灌点米湯。直到我清醒，才看見大女痴呆呆地站在我身边，发觉自己躺在家里的床上，我就寻摸自己的奶娃……。

“我問丈夫：五斗二升租谷为啥要交二十块銀元？他說，我住了七天水牢，刘文彩要收七天房錢，一天一斗米，七天七斗米，还是講了人情少了价的。我忍不住抓着他的双手，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場。

“自己能下床了，望見我那身血水衣服，发愁怎么洗得干淨，心想不要吧，又沒得穿的。我的头发，早就被血水凝成一綹一砣的了。洗不淨，梳不开，逼着我又拿起剪刀剪头发，头一回剪头发我是个娃娃，这一次，是有了娃娃的媽媽……。

“借了二十块銀元，又是利滾利，你們会想得到我家的生活。”

冷媽媽說完了。我們都透不过气来。她理了理灰白的头发，反而寬解着我們：“你們做啥发愁，現在我还活着呀。过去的的生活再苦，我总沒有倒下去。有时想想过去，就会加倍热爱今天的生活。眼前有一点点困难，这算得了什么，我就常常說我那几个娃娃，你們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从解放第一天起，我就沒想到自己，我晓得該怎样工作。”

要不是公社党委会的干部来催冷媽媽开会，我們相信冷

媽媽还会向我們叙述她嶄新的生活。冷媽媽去开会了，我們向她的家里走去。一个小姑娘，头上扎了一个紅綢蝴蝶結，坐在門坎上，偏着头伏在小桌上写字。有人告訴我們，她是冷媽媽的么女，剛滿八岁。我們走攏她身边，看她写字，她赶紧双手蒙住本子，抬起头来，一双圓溜溜的眼睛調皮地望着我們。她真像冷媽媽。知道她八岁，又引起我們想到冷媽媽和她姐姐在八岁时的遭遇。而这些遭遇，是这个調皮又喜悅的小姑娘完全不知道的。

六

回到庄园，心情无法平靜。冷媽媽仅仅是刘文彩成千佃戶中的一个，多少笔墨才能写完千百个冷媽媽的遭遇！而那些比冷媽媽的遭遇更为悲慘的，死在水牢里的階級弟兄，誰知道他們全体的姓名！誰又忍心如实記述他們在水牢里的慘景！地主家的雕梁画柱，全是貧苦农民的骨头，金碗銀筷沾滿了劳动人民的鮮血。

地主階級殘酷的壓迫和剝削，迫使农民起来斗争和举行起义，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我們从地主庄园陈列館里，看到了展覽出的一部分材料。小至刘文彩的雇工谷伦山巧打他的狗腿，李大江領導群众义劫“德昌久”當舖，大至如“万成堰”事件，一万多农民，抬着受害者楊洪順的尸体示威游行，闖进县衙，大鬧公堂，吓得伪县长从后門逃跑。不少材料，記叙了农民群众从自发的斗争到有党領導的自覺的斗争。一九四八年，刘文彩枪杀了共产党员肖汝霖同志，更加激发了农民群众



的阶级仇恨。一九四九年，解放大军挺进西南，党的大邑地下组织迅速发动了农民武装斗争。一处火起，四面燃烧。农民们捧下镰刀、簸箕，从屋角、墙角，抓起步枪、梭标，在斜江两岸开展了武装减租的斗争。斗争矛头针对着刘文彩。刘文彩蜷缩在庄园正厅的金丝猴皮椅上，用热帕子贴着光脑壳，两手紧紧按住，半天摸十二道帕子，还一会叫热，一会叫冷，像一条垂死挣扎的疯狗。党领导的武装减租斗争，遍及安仁、唐场、上安、苏场、元兴、三岔、王泗、王场等乡，杀下了刘文彩的威风，惊动了蒋介石。在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中，我们击毙了大邑县伪县长徐元勋，当时重庆的国民党中央社都慌了手脚。就在这时，雇工谷伦山，罗二娘的儿子罗学成，都拿起武器，参加到武装斗争的行列。

七

我們記叙的，只是“地主莊園陳列館”的一部分材料，而“陳列館”的全部材料，也僅僅是已被埋葬了的劉文彩的縮影。我們在安仁、唐場一帶，看到了劉氏家族無數的地主莊園。千筆萬紙，也寫不盡地主階級的罪惡。

這些莊園，早已歸人民所有。現在都是幼兒園、學校、拖拉機站了。但是，在莊園內的油燈下，有同志告訴我們，住在附近的地主安選清，仇恨貧農住着他的莊園，就在前幾天，還在鬼鬼祟祟地搗毀這棟房子。這個材料，難道不能引起我們深深的思索？

我們在調查過程中，深深感到不能忘記過去。想想過去，會使我們對於一部分地主階級分子、資產階級分子以及世界上一切反動派的陰謀活動更加憎恨和警惕。

階級鬥爭存在着，人們呵，要警惕！

1961.5.7 于成都

吳靜波插圖